

## 東鄉族簡介

東鄉族人口約有五十一萬三千八百多人（依據西元 200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其中半數以上聚居在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東鄉族自治縣，其餘則分佈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臨夏回族自治州其他各縣。

東鄉族的語言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但使用漢文，信仰伊斯蘭教，有新教、老教之分及「門宦制度」（就是教派中的小派系）。

東鄉族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但在 1960 年前，富有人家也有行一夫多妻制，這是伊斯蘭教所不禁止的，一般家庭大多有五口人，兒子成年結婚後就和父母分居，另行組織家庭，家庭中父親地位極重要，由於宗教關係，翁媳、兄和弟媳之間，都有迴避的習俗，經常不見面，也不交談。小孩出生後，立刻請阿訇爲新生的嬰兒取經名。

東鄉人以麵食爲主，而麵食又以饅饅（也就是饅頭）、麵條爲主，可食牛、羊、雞肉，依照伊斯蘭教規規定不食豕、犬、一切動物的血以及怪異兇猛的動物。貧窮人家多半以洋芋或散飯（由青稞、糜穀、大小豆等雜糧煮成麵糊，叫做散飯）爲主食。吃飯時，一般是在坑上放一張矮桌，桌上放食物茶水，家人盤膝圍著矮桌而坐，坐位以坑內靠牆邊的爲首位，平時父母跟子女可以同桌用餐，媳婦只能在廚房內取食。東鄉人喜歡喝茶，每餐必定有茶，多半用蓋碗泡茶，早年貧窮人家買不起茶葉，只好用當地土產的甘草代替茶葉。

東鄉人非常好客，當客人到家時，立刻請到炕上首位坐下（女客可以不脫鞋就上炕），並且用家中最好的茶飯招待來客，家境富裕的人更以雞肉，手抓羊肉等待客，如果是用雞肉待客時，一定將雞尾讓坐首位的客人吃，以示尊敬。來客是男性的話，由男主人接待，婦女一概迴避不出，男主人陪男客時，一般是站在桌旁爲客人盛飯、挾菜，自己也不坐下來吃；女客則由女主人招待，女客可以跟男客同桌用餐。

「花兒」是東鄉人民喜愛的一種民歌，用漢語唱，分爲抒情，敘事兩類，形式有獨唱跟對唱，聲調高亢，歌詞是即興編詞。體能活動方面喜歡摔跤運動，不少人還喜歡放鷹抓兔，早年東鄉族青年男女還愛玩「閃嘎守」這是類似蕩秋韆的一種活動。

東鄉人實行土葬，不用棺槨，提倡速葬、薄葬，人死後三天之內必須下葬，在這三天內喪家不設宴待客，人死後要請阿訇唸經。

## 目 錄

西夏前期史.....	孟 鴻	1
《燕行錄》的傳承.....	王永一 林基中	27
《詩經》中有關邊族紀錄的探討.....	張華克	39
新疆維吾爾古典音樂木卡姆 .....	周菁葆	55
現代國家疆域的歷史與民族分裂的關係 .....	吳楚克	67
清朝治理西藏體制的歷史考察.....	余祺燁	81
稿 約 .....		90

# 西夏前期史

孟鴻

中國文化大學兼任教授

## 摘要

西夏，是以黨項羌為主體所建立的一個地方性政權，也是一個王朝，其情形就如同諸胡列國（就是一般史書所說的五胡十六國，因為不止五胡，更不止十六國，所以宜以諸胡列國稱之較為合適，另向者都以五胡亂華稱五胡十六國時代，更不妥適，蓋古往今來，並無任何律法規定，中國大地必須由華夏民族或漢族命王稱帝，否則就是「亂華，所以筆者在所有論著中，都徹底排除「五胡十六國」與「五胡亂華」這兩個辭彙，西夏就跟諸胡列國、北魏、契丹、金一樣，但是北魏、遼、金，以其各有一部《魏書》、《遼史》、《金史》，而被列為正統王朝，西夏由於缺少一部專史，因而沒有被納為正統王朝，若論國祚，西夏自（李或趙或拓跋或嵬名）元昊正式稱帝定國號為「白上大夏國」，至末帝李睍被蒙古軍所殺，前後享祚一百九十年（西元 1038～1227 年）享祚之長，較諸任何中原王朝毫不遜色，本文擬就西夏正式建國前的黨項情況酌加介述。

關鍵詞：黨項、西夏、元昊

黨項，是羌族的一支，以其早期從今青海、甘肅、四川三省交界處的群羌聚居之處，遷到宕昌一帶駐牧，宕昌、黨項音近，而被稱為黨項羌，一般文獻就直接稱之為「黨項」，其實就是羌族。諸胡列國時期，鮮卑慕容部的吐谷渾曾經統治其地，而鮮卑乞伏部、禿髮部的西秦、南涼都跟西羌聚居地有所關聯，這些鮮卑部族雖然最後都融入羌人之中，但黨項羌中

仍然保留有拓跋姓氏，可見黨項跟鮮卑吐谷渾、禿髮、乞伏各部應該有血緣上的關聯，探討黨項，應該有這份先決的認識。

據《新五代史·黨項傳》說「（黨項）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後唐莊宗李存勳年號共四年，西元 923~926 年）以後，大姓之強者各自來朝貢」這裡所說的「大姓之強者」顯然是指黨項中的拓跋部，後梁成立之後，於梁太祖開平元年（西元 907 年），加拓跋思諫檢校太尉兼侍中，次年十一月，拓跋思諫死，遺命立拓跋思恭的孫子彝昌為留後，不久，後梁就正式以拓跋彝昌為定難軍節度使，正式授以旄鉞（旄，音冒，是一種飾有犂牛尾的旗幟。鉞，音月，是一種兵器，有象徵權力的意思），拓跋彝昌或李彝昌嗣立不久，夏州內部發生內亂，在西元 909 年（後梁太祖開平三年）夏州都指揮使漢人將領高宗益起兵，襲殺李彝昌，緊接著夏州將吏（很可能都是黨項人）又殺了高宗益，迎立拓跋思恭的兒子李仁福，此時李仁福正以夏州蕃部都指揮使戍兵在外，他也是李彝昌的叔父，不久，後梁就以李仁福為定難軍節度使，其實當時後梁根本無力控制夏州，給予虛名，至少表示「中央」的威望。從高宗益的襲殺李彝昌，以及擁兵在外的李仁福重新掌握夏州，似乎可以推論夏州內部漢人跟黨項人的權力鬭爭，最後以李仁福重握權秉，黨項人贏得這場鬭爭，似乎也說明夏州這個地方，黨項人成為主體民族。

在夏州發生權力鬭爭時，立即引起附近岐王李茂貞覬覦夏州的想法，就在西元 909 年七月，李茂貞遣劉知俊等攻夏州，這個劉知俊原是朱全忠麾下大將，官拜匡國節度使，後來以功高震主，為後梁太祖所猜忌，劉知俊心中不安，就以自己所駐守的同川降附於岐王李茂貞，李茂貞以為中書令。李茂貞一面命劉知俊攻夏州，另一方面約河東晉王李存勳（沙陀人）遣軍進攻後梁北邊各州。在當時的情形後梁的西邊是李茂貞的勢力範圍，北面是沙陀李存勳的轄區，只有在夏州的黨項李氏（原拓跋氏）跟靈州的韓氏附於後梁，所以李茂貞鼓動沙陀人李存勳進攻後梁的北邊，而他自己則謀奪夏，靈兩州。後梁朱全忠立即派鎮國節度使康懷真（此人祖先很可能來自中亞康國，也就是今天的薩馬爾罕，所以以康為姓）攻打岐王李茂貞所屬的邠、寧，以此救靈州，康懷真先後攻下寧、衍二州，又拔慶州南

城逼得劉知俊不得不解靈州之圍，回軍攻康懷真，果真戰勝康懷真，李茂貞一高興就以劉知俊爲彰義節度使鎮涇州。

次年（西元 910 年）七月，李茂貞又跟李存勖合兵五萬，要攻打夏州，以雷霆萬鈞之姿，大有「俯拾夏台」之勢，黨項李仁福據城固守並且向後梁告急，這時後梁供奉官張漢孜、國禮使杜廷隱正在夏州，也發動州民晝夜固守夏州，後梁得到夏州的告急，但是擔心晉王李存勖攻他的懷州一時不敢出兵救夏州，後來得知李存勖率軍在綏銀沙磧攻圍夏州，既無後顧之憂，乃決定派夾馬指揮使李遇、劉綰從鄜、延奔向銀、夏，阻斷晉王李存勖的歸路，李仁福據城固守了一個多月，到了這年九月，後梁李遇的援軍到夏州，李存勖及岐、邠、寧各軍有所恐懼，只好退走，夏州之圍遂解，夏州黨項拓跋家族的勢力及根據地，總算保存了下來。到了西元 915 年（後梁末帝朱友貞乾化三年）三月，後梁「以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李仁福爲檢校太師，進封爲隴西郡王」<sup>1</sup>這是黨項拓跋氏（或李氏）封王之始。

五代後梁一朝一共只有十七年（西元 907~923 年），國祚雖短，但對黨項拓跋氏（李氏）家族卻極盡籠絡之能事，不但兩度出兵解夏州之圍，更不次加官晉爵，而且讓黨項李氏有了「王」的名號，李仁福對後梁也算相當忠心，如後梁末帝朱友貞龍德二年（西元 922 年）時，晉王李存勖率兵圍德勝，後梁末帝徵諸道軍赴援，李仁福就進貢五百匹戰馬助戰。

西元 923 年，晉王李存勖滅後梁，建立政權國號唐，史稱後唐，建元同光，李仁福以夏州一隅人寡勢弱，迫於情勢，稱臣於後唐，李存勖在其同光二年（西元 924 年）四月，「以夏州節度使李仁福依前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夏州節度使，封朔方王。」<sup>2</sup>這顯然是後唐既無力滅掉夏州的黨項勢力，又以前來稱臣，不如加以籠絡，這也是自古以來中原王朝對四周少數民族一貫的羈縻政策，所謂「捨虛名而收實利」的措施，雖然後唐李存勖族出沙陀，只是進入中原建立政權，就以中原王朝，也就是天朝自

<sup>1</sup> 《五代史·梁末帝紀》一般文獻稱《舊五代史》因有《新五代史》而把原《五代史》冠以「舊」字，實在不合理，按薛居正撰《五代史》時，絕不能預知歐陽修將另撰《新五代史》而自動冠以「舊」字，故此處仍用《五代史》，蓋積非不能成是，眾口也無法鑠金。

<sup>2</sup> 《五代史·唐宗紀》。

居，之前的北魏、北周，同時代的遼，稍後的金，更晚的元、清都是如此，這是中國歷史的趨勢，也是民族融合必然過程，以往如此，未來也難例外。西元 933 年（後唐明宗李嗣源長興四年）黨項李仁福死，由子李彝超嗣立，追尊李仁福爲虢王（虢，音國，周時國名，在今河南成皋縣。注意，在古代「國」字只是一塊地方，跟十八、九世紀以後的國字，意義完全不同）。

黨項拓跋李氏家族一直雄踞夏州，形成一股地方割據勢力，唐中葉之後中央無力，只好任其稱雄一方。其實任何中央政府只要實力夠強，絕不容許地方割據，後唐成立後，表面上仍維持以往籠絡羈縻措施，但骨子裡一直想剷除這一股地方割據勢力，只是在等待機會。李彝超之嗣立有些疑點，李彝超是李仁福第四子，原任夏州左都押牙防遏使，當西元 933 年三月，李仁福病危時，李彝超派押衙賈師溫入朝後唐，矯作李仁福上奏說：「臣病已甚，已委彝超權知州事，乞降真命」<sup>3</sup>這時正是後唐明宗李嗣源長興四年，李嗣源尚稱英明，也想有一番作爲，所以後唐朝廷君臣認爲正是掃除夏州黨項李氏地方勢力的大好時機，因爲此時興起於東北的契丹遼政權遼太宗耶律德光，正積極南下開疆拓土，根據「情報」得知李仁福暗中勾結契丹，所以一旦得知李仁福病危，就認爲是剷除夏州黨項李氏勢力的大好良機，但是還是不敢貿然出兵，而是想出以「遷鎮」的方式，讓黨項跟夏州作個切割，於是命李彝超改鎮延州，爲延州留後，並以他的叔父李思瑤爲夏州行軍司馬，以他的長兄李彝殷爲節度使，又把原延州節度使安從進任命爲夏州留後，想透過這一連串的人事變動，把黨項李氏勢勵逐出夏州。

爲了讓李彝超就範，又命邠州節度使蔣彥稠，宮苑使安重益（這個人跟前面的安從進，都很可能是中亞安國人後裔）率領軍隊護送安從進到夏州出任留後<sup>4</sup>；後唐明宗以「懾之以兵威」方式，護送安從進赴任，另一方面則對黨項李氏出之以「慰撫」，後唐明宗在詔書中說：「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公私債負，殘欠稅物，一

<sup>3</sup> 《冊府元電》卷 439。

<sup>4</sup> 留後，留守後方長官的通稱，唐節度使，觀察使或出征或入朝或死亡，未有人正式接任皆先置留後，留後遂成爲正式官稱。

切並放；兼自刺史，指揮使、押衙已下，皆勒依舊，各與改轉官資。」<sup>5</sup>除此之外，之前曾有王都，李賓（《資治通鑑》作李匡賓）都是在明宗天成三至四年間（西元 928~929 年）據守一方的地方豪酋，由於不聽從後唐的調遣，而被後唐派兵滅掉的藩鎮，另有李從讞（原為岐隴節度使），高允韜（原鎮鄜延）則是後唐建立後，主動「舉旗歸朝」，後唐都給予獎賞，所以後唐明宗在詔書中又說：「彼或要覆族之映，則王都、李賓足為鑑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讞可作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sup>6</sup>這種利誘、威脅兼而有之的詔書，且看黨項李彝超如何接招。

夏州是黨項李氏的根據地，現在後唐要他離開，這豈不是要刨了黨項李氏的根，對拓跋李氏來說，這是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頭，既無力明白舉兵對抗，又不甘束手就縛，在這進退維谷之際，李彝超於西元 933 年（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四月，上書後唐稱：「奉詔除延州留後，已受恩命訖，三軍百姓擁隔（意為三軍百姓挽留），未遂赴任」<sup>7</sup>以這種軟性的方式，拒絕了後唐的詔命，唐明宗派閣門使（閣門司的長官，掌閣門內禮儀）蘇繼顏帶著後唐明宗的詔書，跟夏州押衙賈師溫一起奔向夏州，要李彝超依詔赴任，只是蘇繼顏一行到蘆關（就是蘆子關），為黨項兵所阻，蘇繼顏只好返回汴京，一時之間後唐對李彝超也無可奈何。這時，後唐隰州刺史劉凝馳驛入朝，向後唐明宗獻策說：「臣所部與綏、銀二州接境，二州漢戶約五千。自聞國家攻討夏州，皆藏山險。請除二州刺史，各與二、三百人為衙隊，令其到郡招撫，則不戰而下兩州矣」按綏、銀二州屬於夏州，且為夏州的外圍，劉凝的意思足趁此時新任命綏、銀二州刺史，各給二、三百個衙役，前去招撫這兩州的漢戶，這樣就可以輕而易舉拿下綏、銀兩州，這兩州一旦拿下，夏州也只在旦夕之間。後唐明宗為了慎重起見，要左右大臣表示意見，樞密使範延光說：「綏、銀二州的漢戶，朝廷曾予以撫育，但是他們長久以來跟黨項部落雜居，內心的想法反覆無常，最近聽說安從進初到蘆關時，黨項部落都望風歸附，於是都給予勉勵，並且要他們各自回家安心營生，安從進於是上馬登山，還沒走上百步，這些黨項番

<sup>5</sup> 《五代史·李彝超傳》。

<sup>6</sup> 同註 5。

<sup>7</sup> 《五代史·唐明宗紀》。

戶馬上回過頭來襲擊安從進，護衛安從進的十幾個騎兵幾乎招架不住，至於劉遂凝所說給新任刺史二、三百個衙役以壓制狡猾的黨項番戶根本行不通，…況且朝廷之患在夏州，只要夏州一旦平定，綏、銀二州自然望風歸順，如果沒有信心拿下夏州，還是按兵不動為宜，劉遂凝之策不可採。」劉遂凝被範延光這麼一分析，也自知所獻之策不可行，但是不久他又獻策說：「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彝超乃次子也，長子彝殷為夏州留後，彝超征詔赴闕，則諸蕃歸心矣！臣請以百騎入夏州。」這個劉遂凝消息真不靈通，李仁福有四個兒子，長子彝殷，次子彝謹，三子彝氈，四子彝超，劉遂凝連李仁福有幾個兒子都搞不清楚，妄談黨項事物，豈能中肯，試想徵詔李彝超入朝，他豈肯乖乖就範，他所獻的第二策，又被範延光駁倒了。可見古往今來政府處理邊疆民族事務，有很多劉遂凝者流，所以二千多年來，邊疆少數民族事務始終沒有處理好，因為有太多的劉遂凝了。

後唐朝廷還在討論如何處理黨項盤據夏州的問題，就在此時後唐朝廷接到延州的奏報說：「蕃部劫掠餉運及攻城之具，守蘆關兵退守金明鎮。」<sup>8</sup>看來黨項李彝超拒絕遷鎮後，知道後唐朝廷絕不肯善罷甘休，訴諸兵戎已是在所難免，所以積極備戰，「遣其兄阿囉王守青嶺門，集境內黨項諸胡以自救。」<sup>9</sup>而劫掠餉運及攻城之具，是先發制人的作法，到了西元 933 年五月，安從進率軍抵夏州（安被派為夏州留後，由葑顏稠，安重益以兵護送安從進赴任），夏州城舉烽火，黨項等雜胡千多騎來支援抗拒，安從進派先鋒宋溫擊退這千多騎雜牌軍，七月安從進，葑顏稠等向夏州城進攻，這個夏州城可是座歷史名城，諸胡列國時，匈奴赫連勃勃所建的統萬城，是赫連夏的首都，統萬城是赫連勃勃取的名，意思是要統御萬邦，他命薛干阿利為「將作大匠」<sup>10</sup>，在朔水之北、黑水之南，大約是現在陝西省榆林地區靖邊縣北境約一二〇里處營建此志，極其壯觀且極堅固<sup>11</sup>，後唐軍隊當然是久攻不下，而李彝超又命成千上萬黨項人騎著馬徜徉四野，趁隙掠奪安從進等軍隊的糧草，致使後唐軍隊無所芻牧，而山路險

<sup>8</sup> 《五代史·唐明宗紀》。

<sup>9</sup> 《資治通鑑》卷 278。

<sup>10</sup> 負責土木營造的官。

<sup>11</sup> 關於統萬城詳情請參看劉學銑《胡馬渡陰山》一書頁 156~159，臺北知書坊 2004 年出版，本書後面也會提到。



峽，從關中運糧草來路既不好走，運費又貴，這對後唐而言極為不利，李彝超兄登上城堞對安從進說：「孤弱小鎮，不勞王師攻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爲僕聞天子，乞容改圖。」希望透過輟性的訴求，可以改變後唐的士氣，安從進、葑彥稠圍攻夏州城（原統萬城）三個月無法攻下，後唐明宗這時也知夏州難以取得，與其耗時費日浪費糧餉，不如引兵退回，於是安從進等撤兵後退，但李彝超卻領兵追擊，後唐軍隊大敗而回，夏州黨項李氏家族擋住後唐的進攻，又躲過了一次劫難，黨項的實力又保存了下來。

夏州黨項李氏家族之所以能夠贏得這次戰爭，在客觀因素固然得利於堅固城牆及後唐的長途補給；在主觀因素方面，夏州黨項雖然割地自雄，但自唐末以來，從不介入藩鎮之間的權力鬭爭，所以雖然位處西北貧瘠之地，幾十年來休養生息，人口大量增加，經濟也得到很大的發展，黨項在唐末五代亂世中，具有一定的實力，尤其自從拓跋思恭被封爲夏國公後，夏州黨項拓跋氏（李氏）就成爲各地黨項族所歸心的對象，這也就是後唐安從進圍攻夏州城時，會有萬騎黨項徜徉四周，趁隙劫掠後唐糧草的原因所在。之前後唐以黨項李仁福私通契丹，所以才出兵圍討黨項，其實這只是後唐要強制黨項遷鎮的一個藉口，等到後唐圍攻夏州不成後，才知道這只是「（李）仁福畏朝廷除移，揚言結契丹爲援，契丹實不與之通也；致朝廷誤興是役，無功而還。」<sup>12</sup>當初提供黨項鉤結契丹消息給後唐朝廷的人，想必是劉遂凝之類人物。

這次後唐圍攻夏州黨項，雖然以灰頭土臉收場，但雙方關係並未因此而決裂，至少夏州黨項仍然尊後唐如中央政權，西元 933 年八月，李彝超自行發表他長兄李彝殷爲綏州刺史後，仍然上表後唐朝廷請求再正式予以發佈，可見當時黨項還是很重視中央王朝，認爲經過中央王朝的任命，這個官才是真的官，當然另一方面李彝超也想藉此項請求，以測試後唐是否還把黨項視爲寇仇，後唐明宗在戰不能勝的情況下，能維持以往的關係，也未嘗不可，所以說政治上既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後唐明宗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同意給予任命，而李彝超也識趣的上表「謝罪」，但是同時要求「昭雪」，後唐明宗在籠絡、羈縻的前提下，強行忍

<sup>12</sup> 《資治通鑑》卷 278。

下心中的不滿，於這（933）年十月下詔：「權知夏州事，起復雲麾將軍，簡較（按即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李彝超，可依前起復簡較司空，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南（係難之誤）節度，夏、銀、綏、宥等州押蕃落等使。」<sup>13</sup>當這個詔書發出後，李彝超滿意了，也就在同月向後唐貢馬五十匹，表示仍願臣屬於後唐，在這一場政治角力中，黨項李彝超顯然棋高一籌，也因此黨項李氏一族在黨項各部落中聲望又提升了許多，不僅如此，在這場政治兼軍事鬭爭中，表明夏州黨項李氏的實力，已經可以跟中原王朝一較高下，這種情形正如《資治通鑑》所說：「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sup>14</sup>從此也激起夏州黨項自立門戶，以便跟中原王朝一較高下的信心與意念。

西元 935 年（後唐末帝李從珂清泰二年）二月，夏州黨項李彝超病故，臨終前上書後唐以長兄李彝殷為夏州節度使，三月，後唐正式以李彝殷為定難軍節度使。隔年後唐亡，後晉石敬瑭在割燕雲十六州給契丹，而獲得契丹支持，建立晉政權，史稱後晉，建元天福，後晉高祖石敬瑭於其天福二年（西元 937 年）大封諸鎮時，對夏州節度使李彝殷也「並加食邑實封。」<sup>15</sup>

西元 943 年（後晉高祖天福八年）九月，夏州黨項李氏內部發生一場權力鬭爭，事情起因是夏州牙內指揮使拓跋崇斌與綏州刺史李彝敏、李彝俊（都是李彝殷的族弟）相結合，企圖發動一場政變，要刺殺李彝殷奪取節度使大權，結果事機不密，被李彝殷察覺，於是先下手收斬了拓跋崇斌等五人，李彝敏一見事機敗露，乾脆率軍來攻夏州城，前面提到夏州城極其堅固，之前後唐大軍尚且無法攻破，豈是區區綏州一隅之兵所能攻下，很快就被李彝殷擊潰，李彝敏一見勢已去，只好攜同弟弟李彝俊及親眷等二百七十口投奔後晉延州，後晉朝近得報後，很有政治智慧的將李彝敏等送回夏州，結果自然是斬首了事，這一場權力鬭爭也就很快也很殘酷的落幕了。至於後晉之所以會把李彝敏一夥送回夏州，不純然後政治智慧問

<sup>13</sup> 《冊府元書》卷 178。

<sup>14</sup> 《資治通鑑》卷 278。

<sup>15</sup> 《五代史·晉高祖記》。

題，原來石敬瑭以割燕雲十六州換取契丹支持，當上皇帝，且對契丹自稱兒皇帝，但是契丹並沒有善待石敬瑭，更是經常予以威逼，只當了七年皇帝，就一命嗚呼，但是卻留下千年兒皇帝的罵名，石敬瑭死後，由石重貴嗣立，是爲出帝（後來被契丹抓到契丹國內），所以跟契丹關係相當緊張，這時李彝敏一行前來投靠，當然不敢收留，因爲他希望一旦契丹南下攻打晉，夏州黨項能助一臂之力，所以將李彝敏一行送回夏州，以爭取李彝敏的好感，「國際」政治只有利害，沒有什麼信義可言。

後晉出帝石重貴恥於當兒皇帝，所以常有抗拒契丹的言行，這自然引起契丹不悅，果然就在他開運元年（或作天福九年、西元 944 年），契丹率大軍南下，要「懲罰」這個不聽話的「孫皇帝」（石敬瑭對契丹自稱兒皇帝，石重貴當然要降一格成爲孫皇帝），石重貴詔令黨項夏州節度使李彝敏出兵協防，李彝敏就奉詔跟銀州刺史李彝沼合番漢兵四萬人，北上麟州、渡過黃河，攻入契丹地界，使契丹南下討伐後晉的勢頭受到牽制，這對後晉而言，是有功勞的，所以後晉以李彝敏爲契丹西南招討使，這場戰役後來以契丹大軍撤回沒有打成。二年後（西元 946 年、後晉出帝開運三年），契丹再度大舉南下，滅了後晉，而且把石重貴給抓走了，使國史上的俘虜皇帝又多了一個（在石重貴之前有西晉懷愍二帝、南朝陳後主，在他之後有契丹天祚帝、北宋徽、欽二宗、明英宗）<sup>16</sup>次年（西元 947 年），原後晉河東節度使劉知遠自行稱帝，國號爲漢，史稱後漢，第一年仍用天福年號，隔年（西元 948 年）改元乾祐，然而就在這一年劉知遠龍御上賓，由他兒子劉承祐嗣位，是爲後漢隱帝，仍用乾祐年號，偏居西北的夏州黨項李彝敏本諸傳統「拜廟不拜神」的原則，仍然向後漢稱臣，而後漢也以之爲「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並加兼侍中」<sup>17</sup>，可見在錯綜複雜的「國際」情勢中，弱勢國家求生之道，重於徒逞口舌之快匹夫之勇，黨項侷處西北一隅，人寡地瘠，必須夾縫裡求生，可見黨項李氏

<sup>16</sup> 關於後晉出帝石重貴被俘後送往契丹的詳情，宋人葉隆禮的《契丹國志》卷三、四有詳載，但葉氏乃據《資治通鑑》及《歐史·晉家人傳》的《高后李氏傳》撰成，今人賈敬顏改題爲《晉出帝北遷記》並加以疏證列《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記十三種疏證稿》首篇，北京中華書局 2004 年出版。可以參看。

<sup>17</sup> 《五代史·漢隱帝紀上》侍中，秦始置，本爲丞相屬吏，以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稱侍中，漢時因侍從皇帝左右，出入宮廷，地位漸形貴重，魏晉以後實際已形同宰相，此處只是虛銜表示重視之意。

一族具有極高的政治智慧。

這時後漢隱帝初立，後漢鎮國節度使（鎮河中）兼中書令李守貞跟原永興節度使趙思綰、鳳翔節度使王景崇聯合謀叛，李守貞更自稱秦王，派人以大筆金錢貨物賄絡夏州節度使李彝殷，希望他能出兵相助，於是李彝殷上書後漢朝廷說是：之前三年，羌族唃廝囉殺了綏州李仁裕然後叛逃，請發兵討伐，朝廷以「今歲不利舉兵」為由，諭止之<sup>18</sup>。李彝殷之所以要發兵討三年前羌族唃廝囉的叛逃，這只是藉口，他發兵屯駐延、丹二州境上，一則為李守貞的反叛助威，另一方面則整軍經武，屯駐邊境，靜觀事態的演變，以免中原一旦有警，而受池魚之殃。

後漢乾祐元年（西元 948 年）十月，李守貞謀叛事件敗露，後漢各鎮軍隊把李守貞圍困在河中，情勢顯然不利於李守貞，李彝殷一看苗頭不對立刻撤兵退回夏州，這件事被延州節度使高允權所偵知，而高允權向來跟李彝殷不和，於是向朝廷上奏說李彝殷起先陣兵邊境是要呼應李守貞，而今一見勢頭不對，才撤兵回夏州<sup>19</sup>而李彝殷也上書朝廷辯解，其實後漢朝廷實力不強，根本無法約束地方各鎮，一個李守貞都還沒解決，那有餘力解決延州跟夏州的爭執，所以下詔要延、夏兩州和解。隔年（西元 949 年）李守貞、趙思綰、王景崇三鎮的亂事還在繼續進行之中，夏州黨項李彝殷向後漢朝廷獻馬，同時要求朝廷把靜州劃給夏州為屬州，按靜州是唐時新設置的，唐朝對來降的黨項人，特別從銀州劃出一塊地，以安置來降的黨項人，這塊地就叫做靜州，這地方大約在今天的陝西省榆林地區橫山縣無定河以北之地，關於靜州設置及沿革，今人楊蕤曾撰有《西夏地理研究》一書<sup>20</sup>可以參考。後漢朝廷同意把靜州劃給黨項李氏，這樣一來黨項李氏就擁有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後來西夏建國，就是以這五個州為基礎。從這裡可以看出黨項李氏很能掌握機會，尤其是關鍵時刻，擴張自己，凡是中原有藩鎮要謀叛時，黨項李氏都會暗中加以支助，但是又不介入，所以各謀叛的藩鎮無不極力重賄黨項李氏，也養成黨項自大心態，而五代各朝實力都不強，對黨項李氏也都以重賞羈縻方式，只求名義

<sup>18</sup> 《資治通鑑》卷 288。

<sup>19</sup> 《五代史·漢隱帝紀上》

<sup>20</sup> 該書由北京人民出版社於 2008 年出版。

上的臣服，就心滿意足了，所以《資治通鑒》卷 288 就指出：「（李）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心，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

到了後漢乾祐二年（西元 949 年）九月，後漢終於平定了李守貞等三鎮之亂，後漢隱帝於是大封群臣，黨項李彝殷也撈了個「兼中書令」的虛銜。後漢隱帝劉承祐只高興了一年，在他乾祐三年（西元 950 年），樞密使、侍中、鄴都留守郭威奪取後漢政權稱帝。建國號爲周，史稱後周，是爲後周太祖，建元廣順，同時原河東節度使劉崇在契丹支援下，在晉陽（今山西太原）稱帝，建國爲漢，史稱北漢（爲十國之一，另外九國爲前蜀、吳越、南漢、吳、閩、後蜀、南唐、荆南及楚），轄有并、汾、忻、代等十二州之地。郭威建立後周後，連近在咫尺的北漢都無法納入版圖，對夏州黨項自然無力加以控制，而黨項也深知還沒有實力可以自立門戶，所以對延續中原「正統」王朝的後周仍然奉表稱臣，而後周對夏州黨項除了籠絡羈縻之外，也別無他法，於後周太祖廣順元年（西元 951 年）進封黨項李彝殷爲隴西郡王，而李彝殷眼見鄰近的北漢實力頗大，又有契丹作靠山，既惹不起，就得討好，所以又「遣使奉表於北漢」<sup>21</sup>，這樣鼠首兩端雙面討好，雖不夠磊落卻是小國求生存之道，黨項雖然兩面討好，但是北漢地狹人寡，不如後周的廣土眾民，所以在名義上夏州仍然是後周的一個藩鎮，從此可以見識到黨項李氏一族，不僅有敏銳的政治嗅覺，更有靈巧的外交手腕。

西元 953 年（後周廣順三年），屬於北漢的麟州刺史楊仲訓（又作楊重訓、楊崇勛）被後周境內各府的黨項所包圍，於是向夏州李彝殷求救，並且表示願意歸附後周，這在當時當然是一個重大政治事件，於是立刻向後周朝廷上奏、朝廷下詔要黨項停止攻擊麟州，後周對於麟州來歸順，等於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當然極爲欣喜，而這件事是由黨項李彝殷促成的，論功行賞，進封李彝殷爲西平王，到了後周顯德元年（後周太祖第二個年號其元年爲西元 954 年，後周太祖顯德僅一年即死，嗣位之柴榮爲後周世宗，仍沿用顯德年號，共六年）七月，又增「加守太保」名號。

稍早，在顯德元年五月，後周府州刺史黨項族部首折德辰（辰音移，

<sup>21</sup> 《資治通鑒》卷 290。

意爲門牕間的屏風，也作帝王的座位解）因多次出兵攻擊北漢，這是大有功於後周，後周世宗要折德晟以他所統的兵到京師陛見，以便加以籠絡，按折氏是黨項的大族，如果籠絡得宜，折氏家族願意爲後周效命，後周等於在對付北漢、契丹時，增添了生力軍，於是府州恢復設置永安軍，以折德晟爲節度使，這之前折德晟的父親折從阮已經是後周武勝軍節度使，父子二人都是節度使，羨煞當時的人，從而見黨項人數不但多，而且強悍有才華，後周籠絡，禮遇黨項折氏家族，卻引起夏州節度使黨項李彝殷的不滿，他認爲夏州自唐末以來就是節鎮，李氏家族世承襲節度使可以說是官宦世家，理應顯貴，而小小的，晚起的折氏，而今也貴爲節度使，深不以爲然，因此恥與同列；後周世宗顯德二年（西元 955 年），夏州李彝殷下令拒絕府州使者過境夏州入朝後周，這件事後周世宗知道了，就問計於宰臣，宰臣回答：「夏州邊鎮，朝廷每加優借，府州徧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諭彝興（殷），庶全大體。」但是後周世宗卻認爲：「（折）德晟數年以來，盡忠力，以拒劉氏（指北漢），奈何一旦棄之，且夏州惟產牛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爲？」<sup>22</sup>後周世宗柴榮認爲夏州民貧地瘠，日用百貨都仰賴中原，而府州黨項折氏家族，多年來效忠後周，所以他認爲寧願得罪夏州黨項李氏，也不願意放棄府州黨項折氏；於派使者帶著珍寶責備李氏的詔書到夏州，李彝殷見此時後周力量還相當強大，衡量利害得失之後，對後周使者「惶恐謝罪」<sup>23</sup>這件黨項李氏，折氏爭強事件算是和平落幕。到了顯德六年（西元 959 年）八月，後周又加李彝殷「守太傅」的官銜。

後周世宗柴榮相當有作爲，曾在西元 959 年親率大軍北伐，先後收復了瀛、莫、寧三州以及瓦橋關、益津關、淤口關，原想繼續北伐，沒想到正值春秋鼎盛的柴榮突然染患重病，不久就與世長辭，後周宰相范質輔佐柴榮年僅七歲的兒子柴宗訓繼位，史稱後周恭帝。按後周世宗柴榮曾協助他養父後周太祖郭威出兵滅北漢，對於武將擁兵奪權，深具戒心，所以即位後也曾令趙匡胤從各地挑選強壯兵丁，編爲皇帝的宿衛親軍，由殿前司統轄這支精銳部隊，在他臨終前，把他認爲忠誠可靠的殿前都指揮使晉升

<sup>22</sup> 《資治通鑒》卷 292。

<sup>23</sup> 《資治通鑒》卷 292。

爲殿前都檢點<sup>24</sup>，趙匡胤掌握了後周最重要軍權，而且許多禁軍將領又都是他的親信或至交，後周世宗柴榮一死，後周就沒有任何勢力可以跟趙匡胤相提並論，而且繼位的後周恭帝只是個七歲的小孩，沒想這位被柴榮認爲忠誠可靠的殿前都檢點趙匡胤竟然心懷叵測，讓歷史改寫。

西元 595 年十一月（後周恭帝顯德元年），趙匡胤以鎮州（今河北省石家莊市政定縣）、定州（今河北省定縣）動亂的名義，向朝廷謊報北漢會同契丹南侵，後周宰相范質及一些執政大臣，沒有詳查情報的真偽，便於恭帝顯德二年（西元 960 年）正月派殿前都檢點、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趙匡胤率軍前去拒敵，當時後周「主少國疑」內外交困的關鍵時刻，在禁軍中早已有擁立趙匡胤的風聲，當大軍甫出都門到陳橋驛時（陳橋驛約在今河南省新鄉市封丘縣陳橋鎮），一方面由趙匡義（趙匡胤之弟，後來以避趙匡胤名諱，改名趙光義）和歸德軍掌書記的趙普出面，把早已縫製好的黃色龍袍，「強」加上趙匡胤的身體，要他就皇帝位，這就是歷史上「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把戲，趙匡胤就在心既甘、情也願的情況下南面稱孤（陳橋驛在封丘縣，而封丘在汴京也就是開封的正北方約一百公里，說他南面稱孤文意都合）；另一方面則派人把兵變的計劃通知守備京城（開封）的禁軍將領石守信和王審琦，他們都是趙匡胤的心腹，當然毫無疑問的守好京城，等待新皇帝趙匡胤的歸來。

趙匡胤穿上龍袍之後，契丹也不打了，急著趕回汴京（開封）就皇帝位，石守信、王審琦自然是大開城門迎接新皇帝，所幸趙匡胤良心尚未完全泯滅，對後周太后、幼帝下達了「不得驚犯」的命令，趙匡胤坐上龍椅接受群臣拜賀時，原來宰相范質才恍然大悟，之前趙匡胤說要率軍北上討伐契丹，根本都是謊言，要集合軍隊篡奪帝位才是真的，這時才覺悟已經遲了，眼見木已成舟，只好隨其他大臣一起跪拜在地齊呼萬歲；趙匡胤定國號爲宋，後周算是滅亡了，不過趙匡胤後來被諡爲宋太祖，對後周恭帝並沒有趕盡殺絕，封他爲鄭王，趙匡胤即位後建元建隆，由於之後還有一個，南宋，所以稱之爲北宋。

北宋之所以得以建立，依靠的是禁衛軍，實力並不是強大，北邊有強大的契丹、西北則有北漢、所以對占據夏、銀、綏、宥、靜這五州的黨項

<sup>24</sup> 後周至宋初殿前司長官，掌總領禁軍及統率各軍防禦、出征之事。

李氏地方勢力，除了羈縻別無他法，而黨項李氏對中原王朝向來秉持的是拜廟不拜神，只向中原王朝輸誠，而不管是誰建立的王朝，所以北宋建立後，宋太祖加封夏州定難軍節度使李彝殷為太尉，到了北宋太祖乾德五年（西元 967 年），黨項李彝殷死，北宋贈封為夏王，由李彝殷的兒子李光睿嗣立，這期間北宋忙於統一南方的戰爭，對北漢、契丹的遼都採取息事寧人的消極政策，當然更不會對遠在西陲的尚項採取積極的措施，北宋太祖開寶九年（西元 976 年）北宋出兵伐北漢，黨項李光睿也率軍助戰並攻破北漢吳堡寨，「斬首七百級，獲牛羊千計，俘砮（音寨，意也同）主候遇以獻。」<sup>25</sup>因為有此一功勞，北宋加封李光睿為「檢校太尉」，同時為避宋太宗名諱，在漢文史料中，就把李光睿改為李克睿，也就在這一年，李克睿病死，宋太宗為之廢朝二天，追贈侍中，由他兒子李繼筠自行出任權知州事，這時是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西元 978 年）三月，到了同年五月，北宋朝廷就以李繼筠為定難節度使留後。次年三月北宋再伐北漢，李繼筠派其銀州刺史李光遠、綏州刺史李光憲率黨項、漢兵沿黃河列寨，然後渡河以增漲宋軍的聲勢，終於在這年五月滅北漢，太平興國五年（西元 980 年）七月，李繼筠死，他弟弟李繼捧立即立為留後，同年十一月，宋廷以李繼捧為定難軍留後。

自從北宋於西元 960 年建立至西元 980 年，二十年來黨項跟北宋維持和平關係，但是李繼筠死後，由李繼捧嗣立，情勢有了變化，原來是繼捧嗣立之後，要立他弟弟李繼立為留後，可能由於這個李繼立不孚人望，引起諸位叔伯堂弟的怒怨，西元 982 年（北宋太平興國七年）五月，李繼捧的堂叔西京作坊使，綏州刺史李克文上書北宋朝廷說李繼捧不該立，並「請遣使與偕至夏州諭繼捧令入朝。」宋朝當然樂於看到夏州黨項內訌，現在黨項李克文既然有此要求，宋廷自然樂於順水推舟，於是就「以（李）克文權知夏州，作坊副使尹憲同知州事」<sup>26</sup>，宋朝早就企圖剷除夏州割據局面，所以有這個機會當然要加以把握，李繼捧在內家族反對，在外宋朝不支持，於是他自己率家屬到汴京，宋太宗大為欣喜，賜他白金千兩、絹千匹、錢百萬，李繼捧的祖母獨孤氏獻玉盤一、金盤三，宋太宗也

<sup>25</sup> 《宋史·夏國傳上》。

<sup>26</sup>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3，〈太平興國七年五月〉



是厚賜，這裡我們要特別留意這位祖母姓獨孤氏，顯然是鮮卑姓，或者是早先吐谷渾統治階層的鮮卑貴族，也可能是併吞南涼禿髮氏時的鮮卑人，所以我們認為黨項拓跋氏（唐以後漢文史料多作李氏）非常可能是鮮卑的拓跋氏。

李繼捧深覺自己既為自己家族所不容而又覺得宋朝皇帝對他相當禮遇，所以乾脆向宋廷提出：「願留京師，遂獻其管四州八縣」這裡所說的四州，指夏、綏、銀、宥四州，因為靜州時設時廢；李繼捧提出後，這正是宋朝「固所願也，不敢求耳。」於是立即遣使到夏州，「護繼捧思麻以上親赴闕」<sup>27</sup>宋朝這項措施目的是把黨項李氏高層統統接到汴京連根刨除黨項李氏在夏州的力量，黨項李氏豈會看不出宋朝的意圖，當然引起激烈的反彈。這些事都是發生在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五月，到了這年十月，有許多不肯聽從朝廷遷到汴京的李氏家族，如繼捧的堂弟李繼遷等人遷往山區，聯合起來反抗朝廷，結果都被宋夏州兵所擊敗，斬首了五百級，獲牛馬百萬計，宋朝這一作為跟強盜沒啥差別；這年十一月，宋朝又把原來綏州刺史李克憲、銀州刺史李克文招到汴京，改授李克憲為單州刺史，李克文為澧州刺史，讓他們脫離黨項人聚居地區，等於把老虎拔掉牙，威風不起來，同時授李繼捧為彰德節度使，請問一個「空降」無有部曲的節度使，彰德的軍隊跟人民，豈肯接受他的指揮調度？李繼捧因個人受家族排擠，意氣用事以玉石俱焚的作法，把黨項民族的福祉都給犧牲了，何其不智。宋朝幾乎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得到盤據夏、銀、綏、宥各州長百多年的黨項族聚居地區，如果能以同土濟民、胡漢平等的方式，來治理這些州郡人民，時間一久，胡漢融合原是好事一樁，可惜實際的情卻不是這樣，我們且看：

自唐朝以派往夏、銀、綏……等黨項人（其中也有回紇人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邊臣疆吏，對黨項等邊疆少數民族盡壓榨剝削掠奪的能事，如西元 806 年（唐憲宗李純元和元年）宰臣杜佑就曾上疏說：「……黨項小蕃，雜處中國，本懷我德，當示撫綏，向者，邊將非廉，亟有侵

<sup>27</sup> 同註 26，這裡思麻是古代喪服名，以細麻製成，五服之內親屬都要穿戴，此處指五服之內的親屬。

刻，或利其善馬，或取其子女，賄其方物，徵爲徒役，嗟怨既多，叛亡遂起。」<sup>28</sup>這裡所謂「邊將非廉」是極其含蓄的說法，這種巧取豪奪，當然會激起黨項等少數民族的叛逃，宋朝接管了夏、綏、銀、宥…各州後，駐守邊郡官員依然沿襲唐代舊習，史傳載：「靈武節度使馮繼業…領鎮頗驕恣，時出兵略奪羌夷羊馬，戎人不附」<sup>29</sup>又如「開寶二年（西元 969 年）…原穆州。西人（按指西邊的黨項、回紇等族）有犯漢法者，（王）參升不加刑召僚屬飲宴，引所犯以手捽，（捽音卒，拔起。與揪音相通，揪音糾）斷其耳，大嚼，卮酒之下，其人流血被體，股栗不敢動，前後啗（音淡，同啖意爲吃）者數百人。」<sup>30</sup>這種行爲不僅殘酷，而且野蠻令人厭惡，試問黨項等少數民族在這類變態官員統治下，能不叛逃？雖然並非所有的邊臣疆吏都是這麼野蠻噁心，但在裁決上的不公，也令人難以心服，例如規定「諸路蕃官不問官職高卑，例在漢官之下。」<sup>31</sup>這是明顯的民族歧視，當溫仲舒知素州時，把黨項等少數民族強行驅逐到渭水之北，立下碉堡柵欄，限制他們來往；又如翟繼恩知懷州時，「擅配州界熟戶和買糧草，因縱人入諸族帳催督，…催督者憑爲奸欺，誅求數倍，小不如意，則鞭撻隨之。」<sup>32</sup>再如《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中一〇三〈天聖三年（宋仁宗趙禎年號其三年爲西元 1025 年）五月〉條載：「秦（指秦州）有質院，質諸羌百餘人，自少至老局繫之（局音垆，在此作關閉解），非死不出。」這形同終生監禁的不人道作爲，豈是民族融合之道？這些只是史料上找到的資料，史料所未載或者還沒找到的，必然還有一大堆，我們至少可以肯定的說，在北宋統治下的黨項人，絕對不幸福，至於快樂就更談不上了。

當初北宋要把李繼捧五服之內的親屬，都遷到汴京去，當時李繼捧堂弟李繼遷就徹底反對，他曾說：「吾祖宗服食茲土，逾三百年，父子兄弟，列居州郡，雄視一方；今詔宗族盡入京師，死生束縛之，李氏將不血食矣！」他弟弟李繼沖也認爲黨項人不可以離開根據地，他說：「虎不可

<sup>28</sup> 樂史《太平寰宇記·黨項羌》

<sup>29</sup> 《續資治通鑑編》卷十〈開寶二年（969 年）八月庚辰〉。

<sup>30</sup> 《宋史·王彥升傳》。

<sup>31</sup> 《宋史》兵志五》。

<sup>32</sup> 《宋史·密准傳》。

離於山，魚不可脫於淵。」<sup>33</sup>所以李繼遷兄弟率一批黨項族人逃到夏州東北約三百里的地斤澤（今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的巴彥淖爾），結果還是被宋軍追剿，損失慘重，但李氏一族（原拓跋氏）在黨項民族中一向具有聲望也有相當的號召力，李繼遷運用和黨項豪族通婚方式，跟黨項大姓野利氏建立起反宋聯盟。而宋朝在夏、銀…各州的措施，激起黨項人普遍的反抗，無形中這些反抗的黨項人都向李繼遷靠攏，宋朝在這地區一方面壓榨剝削黨項人，另一方面則又積極扶植當地漢人勢力，以漢人法律治理黨項人，這是完全不合處理民族事務的原則，在這之前，諸胡列國時代，那些胡族所建立的政權，都知道胡、漢民族習俗不同，所以特別設立單於台或燕台之類機構，以統治胡族，漢人則屬州郡依漢法處理<sup>34</sup>，宋朝不考慮民族習俗的差異性，不能因人、因地制宜，強以漢人的律法，加諸黨項人，這當然會引起黨項人的反抗，李繼遷深知黨項人普遍反抗心理，跟恢復往日黨項人當家作主的共同要求，於是號召黨項人團結起來，共同反抗宋朝的統治，恢復黨項人「固有」的生存空間，這種訴求就是黨項人的心聲，當然會得黨項人的全力支持，於是李繼遷有了人民、有了武力，聲勢日益壯大，於西元 985 年（北宋太宗雍熙二年）一舉攻下銀州，他自稱定難軍留後，於是在政治上展開了一連串的措施，為後來的西夏國打下了基礎。

當李繼遷凝聚黨項人形成勢力時，正是北宋跟契丹發生激烈、戰爭的時刻，李繼遷善於觀察「國際」情勢，覺得契丹的聲勢跟力量，似乎比宋朝來得大些，況且之前黨項跟契丹沒有恩怨，而此時是黨項爭奪故土的關鍵時刻，權衡利害得失，李繼遷決定向契丹稱臣，以爭取契丹的支援，這時是西元 986 年（契丹聖宗耶律隆緒統和四年、北宋太宗雍熙三年），契丹既跟北宋打得不可開交，黨項前來納貢稱臣，豈有不接納的道理，於是授李繼遷為「定難軍節度使、銀、夏、綏、宥等州觀察處使、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sup>35</sup>這一長串的官銜滿足了李繼遷，契丹善於利用時機，這時契丹大將耶律盼正跟宋朝在泰州作戰，戰況不利於契丹，契丹聖

<sup>33</sup> 《續治通鑑長編》卷 25，另戴錫章《西夏紀》卷一，都有相似記載。

<sup>34</sup> 詳情參看劉學鈞《歷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臺北知書坊出版 2005 年。

<sup>35</sup> 《遼史·聖宗紀》特進，為文散官名，漢時諸侯功德最盛者始封此官。

宗把握機會以宗室耶律襄的女兒爲義成公主，答應三年後嫁李繼遷，這時是契丹聖統和七年（西元 989 年），契丹之所以要在三年後才把義成公主嫁出去，一方面可能是義成公主年紀還小，另一方面則要看黨項李繼遷能否出兵爲契丹助威，國際政治本就是充滿現實利益考量，絕對沒有單純的情和義。

西元 987 年（宋太宗雍熙四年），李繼遷認爲有契丹爲外援，激起雄心壯志，展開對宋軍作戰，又獲得了勝利，宋太宗以多次用兵失利，便採用趙普所建議「以夷制夷」的策略，起用前此降宋的李繼捧爲定難軍節度使，賜姓名爲趙保忠，派他回鎮夏州。這時在名義上有兩個定難軍節度使，一個契丹封的、一個是宋朝給的，稍早契丹又加封李繼送爲夏國王；趙保忠（就是李繼捧）到夏州後，認爲與其跟李繼遷同室操戈，不如建議朝廷對李繼遷加以籠絡羈縻，宋朝也認爲這個主義不錯，於是任李繼遷爲銀州觀察使，也賜姓名爲趙保吉，但是李繼遷已經被契丹封爲夏國王，當然不肯再接受宋朝這個區區觀察使的「安慰獎」，但是也不想給宋朝難堪，只是跟宋朝虛予周旋，因爲他需要跟宋朝互市，以換取許多生活必需品，以及經濟上的利益。宋朝見他不肯接受銀州觀察使的官職，但是又要跟宋朝維持某種關係，其目的是在互市，宋朝爲了迫使李繼遷就範，便想以經濟制裁也就是關閉互市的手段，宋朝認爲李繼遷所統率的黨項人，生活在「銀、夏之北，千里不毛」的沙漠地區，除放牧的牛、馬、羊外，就只有天然的池鹽，這種帶有青色，通稱「青鹽」，一向是關隴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民生必需品，此外，糧食短缺，織品也少，宋朝認爲只要一旦停止互市，黨項人生活就會成問題，這麼一來，就會造成李繼遷統治上的困難，時間一久，李繼遷必會就範，算盤打的相當如意，但是刀是兩刃的，雖可傷人，也會傷到自己，一旦沒了互市，黨項人固然有所不便，關隴人民食無鹽，更是難過，如《宋史·鄭文寶傳》所說的「關隴民無鹽以食，境上騷擾。」所以這項停止互市的措施，不得不撤銷，如此一來，等於助長了李繼送的聲勢。

李繼遷聲勢既然看漲，李繼捧在血濃於水的意識下，轉而跟李繼遷合作，李繼捧也開始暗通契丹，夏州情勢不利於宋朝，於是宋朝派李繼隆率兵出擊，大軍由綏州馳入撫寧縣，攻克夏州，把李繼捧抓回去，並下令毀

夏州城，前面說過這個夏州城是赫連勃勃所建的統萬城，極其堅固，而且是第一座有馬面的城，竟然被宋朝給毀了，這在中國文明史上是一個大損失。按統萬城是赫連勃勃於西元 413 年所建，他自認為將「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所以把這座城定名為統萬城，赫連氏的夏後來被鮮卑拓跋氏的北魏滅掉，北魏改為統萬鎮，唐代改為夏州朔方郡，唐末為定難軍節度使治所，據相關文獻記載，這座「城高十仞（仞，古時以八尺或七尺為一仞），基厚三十步，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sup>36</sup>這座城歷經五百多年而不壞，可見其堅固的程度，宋太宗之所以要毀掉這座歷史古城，認為「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竊據之地」所以要「隳其城」<sup>37</sup>，宰相呂蒙正極力贊成，於是在太宗淳化五年（西元 994 年）下令毀城。當宋朝毀掉夏城城後，把居民強制遷往綏、銀等州。這（西元 994）年秋季，李繼遷又遣使向宋朝納貢謝罪，宋朝見好就收，改授李繼遷為鄜州節度使（鄜州，當今陝西省延安地區富縣），只是李繼遷仍然不接受，而且率軍進攻宋的清遠軍（今甘肅省慶陽地區懷縣），想要奪取靈州，西元 996 年（宋太宗至道二年），宋朝為固守靈州，派軍護送四十萬糧草接濟靈州，這支運送糧草的軍隊，走到浦洛河（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南地區吳忠市之南，北流入黃河）時，被李繼遷軍隊攔截，宋軍大敗，所有糧草都被李繼送給劫走了<sup>38</sup>這對李繼遷而言，就像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一樣，讓他的部隊增添了許多補給，所以不久他又率軍進攻靈州，把靈州團團圍住不肯撤走，宋太宗想徹底解決李繼遷的勢力，親自擬定五路出擊的計畫，派李繼隆出懷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出麟州，全面進攻，準備會師平夏，但是由於糧草運送困難，加以各部隊步調不一，而李繼遷由於熟悉地形，採取「敵來我走，敵走我來」靈活的遊擊戰術，不跟宋軍正面接觸，使宋軍找不到李繼遷的主力，以決勝負，結果曠廢時日，終至糧草無法接濟，結果不得不撤軍<sup>39</sup>。

西元 997 年，北宋太宗死，由其子趙恒繼位，史稱真宗，這是個轉機

<sup>36</sup>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榆林鎮、夏州城》條。

<sup>37</sup> 《宋會要輯稿·方城》條八之三十二。

<sup>38</sup> 宋《太宗皇帝實錄》卷 77、79。

<sup>39</sup> 《宋會要輯稿·兵》一四之一四。

李繼遷遣使北宋求和，真宗初立也不想多事，就任命李繼遷爲定難軍節度使，這個任命使已經納入宋朝版圖長達十五年之久（西元 982~997 年）的夏、銀、綏、宥四州，又落入黨項李氏一族手中，李繼遷總算「光復」傳統的「國土」，就黨項人而言，他可算是民族英雄，他也深知北宋朝廷不容許軍人擁有權力，所以北宋對外基本上相當軟弱，此時李繼遷對於擁有夏、銀、綏、宥四州，覺得並不滿意，他打算開疆闢土擴張實力，於是他的矛頭對準了靈州，靈州位於夏州的西側，後依賀蘭山帶引黃河，地理位置極爲重要，爲唐宋以來邊疆國防重鎮，西控河西走廊，而河西走廊是通往西域的孔道，此一地區是漢人、回鶻（或作回紇）黨項、吐蕃各民族混合雜居之處，也因此靈州也是漢、回紇、黨項、吐蕃各民族都想控制的焦點，李繼遷因之極想攻佔靈州，靈州既然具如此重要的地緣優勢，宋朝自然不能放棄，可是要扼守靈州，要付出很大的代價，自唐代安史亂後，西北地區始終不得安寧，人寡地瘠，要堅守靈州，就得長途運送糧餉，關西人民早已不堪其苦，實無餘力支應靈州的糧餉，所以北宋朝廷就有主張乾脆放棄靈州，如楊億、李沆、王旦、李至、張齊賢等就作這種主張<sup>40</sup>，但是另有一些大臣像通判永興軍何亮以《安邊書》上奏朝廷，認爲絕不可放棄靈州，他所持的理由有以下三點：第一，靈武「地方千里，表裡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放牧耕戰之地」如一旦放棄，等於讓李繼遷不勞而獲，會增強他的實力，對宋朝會造成更大的威脅。第二，「自懷、慶至靈武，僅千里，西域、北庭剖爲二，故其地隘其勢弱，不能爲中國之大患。」如一旦放棄靈州，等於西域、北庭連成一氣，會使中國面臨極大的壓力。第三，契丹雄踞北方，要對付契丹的騎兵，宋朝也必需要騎兵，中國的馬向來依賴河西地區，如一旦放棄靈州，而李繼遷佔有該地，勢必威脅西北各民族，則宋朝戰馬<sup>41</sup>來源就成了問題，更無法面對契丹<sup>42</sup>宋朝官員還在喋喋不休的爭辯時，李繼遷已經動員大軍對靈州展開猛烈攻擊，這時宋朝才感覺事態嚴重，立刻增派六萬大軍前往增援，只是援軍未到，靈州已經被李繼遷給占領了，李繼遷改靈州爲「西平府」，認爲「西平北控

<sup>40</sup> 馮琦《宋史記事本末·西夏叛服》，另《宋史》以上各人本傳。

<sup>41</sup>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4。

<sup>42</sup> 《西夏書事》卷七。

河、朔，南引慶、涼、據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繕城浚濠，練兵積粟，一旦縱橫四出，關中莫所知備。」<sup>43</sup>從這項記載來看，李繼遷不僅對地緣政治相當熟悉，對戰略也已胸有成竹，爲了「繕城浚濠」使西平府（靈州）更爲牢固以凸顯其重要性，於是宣佈以西平府爲都，這時是西元 1102 年（北宋真宗咸平五年）。

次年（西元 1103 年）李繼遷想向東擴張，於是進攻麟州，不利，但他向東不成，轉而向西，渡過黃河、翻越賀蘭山，進入吐蕃族（就是今天的藏族）聚居地區，攻下西涼府（今甘肅省武威地區武威市），西涼向爲河西走廊四鎮之首（自東向西，另三鎮爲張掖，酒泉及敦煌），安史亂後，爲吐蕃占領，漢人或死或逃，留下來的並不多，此時僅有漢人三百戶，這三百戶漢人，據五代後唐明宗李嗣源時（西元 926~933 年），當時權知西涼府留後孫超，派大將拓跋承海來朝後唐，後唐明宗曾予接見，拓跋承海說西涼府原來有來自鄆城人二千五百爲戍兵（鄆城爲今山東省荷澤地區鄆城縣），後來黃巢之亂後就跟中原阻絕，漢人只賸下一百多戶，孫超以及城中的漢人，都是早年山東鄆城人的後代。當李繼遷攻佔西涼府後，不免躊躇志滿充滿矯氣，沒想吐蕃大首領潘羅支趁他不備，發動一次突襲，李繼遷身中流矢傷重而死，由兒子李德明嗣立，這時是西元 1004 年（北宋真宗景德元年）。

西元 1004 年，北宋真宗景德元年、契丹遼聖宗耶律隆緒統和二十一年，對北宋或對契丹的遼而言，都具有特別的歷史意義，原本契丹大舉南侵，北宋真宗在宰相寇準建議下，御駕親征，一戰之後，雙方達成協議，簽訂了歷史上有名的「澶淵之盟」，在北宋真宗立場來看，依澶淵之盟的約定，北宋每年年給契丹「歲幣」十萬兩白銀、二十萬匹絹，是比戰爭開銷來得「便宜」如果純就經濟面看，每年「只」花白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的確比一場戰爭來得廉價多了，而且在漢人史家的筆下，把這筆錢稱爲「歲幣」，而不說是進貢，這種「曲筆」無論如何解釋，都有違史實。至於北宋年給「歲幣」絹三十萬，這其中還有一段「秘幸」，據王稱的《東都事略·曹利用傳》有這麼一段記載：北宋派曹利用爲簽訂澶淵之約的使者，真宗爲息事寧人希望儘早簽訂和約，告訴曹利用必要時絹、銀合

<sup>43</sup> 《西夏書事》卷七。

計一百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宰相寇準私下警告曹利用說，如果起過三十萬，就要斬殺曹利用，結果簽約之後曹利用回來要面見真宗，只是恰巧真宗正在用繕，內侍問到底何事，必須面見皇帝？曹利用以事涉機密必須面稟，內侍說可否稍為透露？曹利用只把三根手指放在面頰，內侍就將這情形演練一遍給真宗看，真以為是三百萬，真喊太多，不過又說如果真能了事，也無不可。後來曹利用入稟才知道是三十萬，真宗頗感欣喜。從《東都事略》這段記載可以知道北宋真宗的御駕親征，只是做個樣子，不惜耗費人民的血汗錢，但求苟安，這在國史上絕對不是一件光彩的紀錄。

澶淵之盟對契丹而言，雖每年憑空得到絹銀三十萬，之後又加碼一倍，但是這猶如甜蜜的毒藥，因為澶淵明約簽訂之後，契丹武力鬆懈了，契丹君臣從此流於逸樂，雖然表面上契丹在當時中國大地上還是一等一的強國，但是事實上已是金玉其表，敗絮其中，此所以後來女真完顏阿骨打只以極少數的兵起而抗遼，就能馬到成功，可見澶淵之盟對契丹並無好處。

回過頭來，李德明（遼史作李德昭）嗣位後，曾遣使向契丹遼告喪，契丹追贈李繼遷為尚書令，並派西上閣門使丁振前往西平府吊慰，次年（西元 1005 年）契丹封黨項李德明為西平王。也就在這一年，北宋或許覺得既然可以以金錢向契丹買到和平，應該也可向黨項買到和平，於是向黨項李德明提出媾和的條件，北宋開出的條件是：以李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年頒金、帛、緡錢各四萬（緡音民，成串的錢的為緡）茶二萬斤，給予內地節度使的待遇，准許黨項人進入內地貿易；撤銷青鹽內輸的禁令（其實這項禁令早就無形中作廢了）。同時北宋也向李德明提出以下七個條件：（一）歸還靈州，（二）限居住在平夏地區，（三）派遣子弟宿衛京城，換言之要黨項李德明派子弟到京城作人質，（四）送回被俘虜的宋朝官吏，（五）解散黨項的蕃、漢軍隊，（六）釋放被俘的宋朝兵民，（七）如果邊境發生糾紛，要聽德宋朝政府處理。這七個條件中，歸還靈州跟送子弟宿衛京師這兩項李德明堅不同意，因此宋朝對允許黨項人進入內地貿易也作了保留，其餘幾乎都達成協議。如果北宋能夠自求多福奮發圖強，以澶淵之盟讓契丹耽於逸樂終至被女真滅亡；以宋黨項和約使黨項步契丹後塵，那麼以金錢外交，換取和平，輒化甚至使敵人腐化，



未嘗不可行；可惜北宋並沒有奮發向上，反而是黨項有蒸蒸日上之勢。

李德明接掌李繼遷之位時，黨項內部並沒有十分團結，各部落仍然擁有相大的自主性，跟北宋訂下和約後，反而穩固了李德明的統治權，李德明比他的歷代祖先擁有更大的統治空間跟統治權，跟北宋簽訂和約後，沒有了戰爭，使黨項人民有時間從事耕牧二十多年（西元 1004~1031 年）的和平，使黨項的經濟有了極大的發展，北宋范仲淹在他的《范文正公集·答趙元昊書》就指出黨項這時是「有耕無戰，禾黍如雲」，經濟是國力強弱的指標，黨項人富起來了，李德明跟著水漲船高，聲望也大起來了，西元 1007 年（北宋真宗景德四年），李德明請求在保安軍（今陝西省延安地區志丹縣）設置榷場，所謂榷場，用現在的話說就在邊境貿易市場，准許黨項或其他少數民族跟漢人貿易，宋朝以繒、帛、羅、綺，跟黨項交換駱駝、馬、牛、羊、玉、氈毯、甘草；以香藥、瓷器、漆器、薑、桂等物，交換蜜、蠟、麝臍、毛褐、獐羚羊角、礪砂、柴胡、茯苓、紅花、翎毛；這些是官方的貿易，至於民間交易，顯然內容更是多樣化，那些以「進貢」為名的，更准許他們在京城（汴京）自由買賣。說起「進貢」，很多都是漢人史家自我膨脹的說法，就以唐代西域昭武九姓康、史、曹、石……等國（就是今天中亞阿姆河、錫爾河之間各個綠洲城市）幾乎都只是商隊（一隊總在五百人左右）前來中國貿易，冒稱是各國派來的使者，以少許的貨物當作「貢品」，目的是把更多的貨物可以在沿途及長安出售，以獲得利益，而兩《唐書》一概把這些商隊當作使者加以載錄；這種情形晚到明末清初，準噶爾前來「進貢」的人馬多達二、三千人，固然有些許貢品，更多的是自行販售的商品，以此類推，黨項的貢使，必然也兼有貿易的性質，可見黨項跟宋朝的貿易相當的發達，雙方的經濟都獲益不少。

黨項人盤踞之地扼西域（含今天的中亞）東來的通路，黨項人以這項地理優勢，強行抽取十分之一的「關稅」，這使得許多西域商人的不滿，因而有裹足不前的，但也有改行海道東來，像大食（就是今天的伊朗、阿富汗及阿拉伯）這麼一來，黨項抽不到過路費，對黨項而言，是一筆不小的損失，所以李德明在西元 1022 年（北宋真宗乾興元年，乾興僅一年）請求宋朝諭令大食貢使必須取道西夏，宋朝似乎沒諭知大食，仍然走海路

到中國，這也是何以宋以後海運日見興盛，廣州、廈門、泉州商業日趨發達的一個原因。

李德門一方面盡力擴張領土，而且鞏固已有的領土，另一方面又設法討好宋朝，所以經常向宋朝進貢馬、牛、羊、駱駝等畜產，宋朝則本諸中原王朝傳統厚贈四裔，所以大量回贈白銀、緡錢、錦、彩、絹帛、布匹、茶、藥以及精工製作的手工藝品，以滿足黨項統治階層的需要。當黨項聚居地區發生災荒時，宋朝又特別開放榷場准許黨項人來採購糧食，就這一點而言，宋朝確實是無虧於黨項，而且也真像個泱泱大國。

李德明在權力穩固之後，也一心想模仿中原王朝天子的物質享受，他早些年已經在夏、綏二州建有驛館，修建道路橋樑，開始講究排場，後來又「役民夫數萬，於鑿子山（在今陝西省延安地區延川縣）大起宮室，綿亙二十餘里，頗極壯麗。」<sup>44</sup>他由夏州前往巡遊時，「大輦方輿，鹵簿儀衛」儼然中原王朝的天子派頭，這裡所謂鹵簿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儀隊。他在發號施令、任命官吏、建立宮室、旌旗等制度方面，已經具有獨立王朝的架勢，「每朝廷使至（這裡朝廷指宋朝），則撤宮殿題榜，置於廡下（廡，音武，指廳堂兩邊的走廊）；使輜始出餞館（輜，音由，皇帝使臣的車子），已更赭袍（赭，音者，紅色），鳴鞭鞘鼓，吹導還宮，殊無畏避。」<sup>45</sup>這裡要把「鳴鞭鞘鼓」加以說明，所謂鳴鞭，又叫靜鞭，是古代帝王仗儀的一種，就是由內侍二個拿著鞭子，這條皮鞭尾端綑上紅絲再加上蠟，在皇帝要出場時，用力甩向地面，使之發出響聲，要大家全神灌注、安靜地恭候皇帝出場，所以叫鳴鞭，也叫靜鞭，鞘鼓也是一種仗儀，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現在看清朝連續劇時，有時還可以看鳴鞭的鏡頭。李德明認為懷遠鎮（原屬靈州，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境內）西北有賀蘭山作為屏障，黃河繞過東南，西平作為前哨，形勢利便<sup>46</sup>所以便此地築城居住，大建宮闕、宗廟、官署，改稱興州，以之作為新都。

李德明雖然懷有命王稱帝的雄心壯志，只是在經濟上還要依賴宋朝，所以在表面上對宋朝還是畢恭畢敬，北面稱臣，可是他的兒子李元昊雄心

<sup>44</sup> 《西夏書事》卷九。

<sup>45</sup> 田況《儒林公議》卷上。

<sup>46</sup> 《西夏書事》卷十。

更大，認為不該再向宋朝稱臣，這個李元昊後來被宋朝賜姓趙，所以宋以後的許多文獻都把他寫作趙元昊，元昊認為如果繼續向宋稱臣，將無法凝聚各部黨項的向心力，並以此勸說李德明，可是李德明另有看法，他告誡元昊說：「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辯說：「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sup>47</sup>從李德明父子這段對話，可以看李元昊（或趙元昊）的野心更在李德明之上，當時黨項北有強大的契丹，蹙不得，東與南有富裕的北宋，也討不了好，要擴張只有個西，當時盤踞甘州（今甘肅省張掖）的回紇族，按回紇汗國盛時，雄踞大漠南北，一度且曾出兵助唐敕平安史之亂，替唐收復東、西兩京，且曾多次迎娶唐朝公主，只是在他北邊有一個新興的黠戛斯汗國（黠戛斯在兩漢時稱堅昆或鬲昆，元時稱吉利吉思，就是今天的吉爾吉斯，在中國境內的稱柯爾克斯），極為兇猛，於西元 840 年滅掉回紇汗國，回紇人四處逃亡，其中一支逃到河西走廊，以甘州為中心，稱甘州回紇，此外還有賀蘭山回紇、秦州回紇、涼州回紇、合羅川回紇、肅州回紇及瓜州回紇等，整個河西走廊幾乎都被回紇所控制。李元昊在李德明統治時期，曾經領兵擊破甘州回紇，回紇可汗夜落隔兵敗自焚，李元昊將夜落隔的妻女抓回來，派兵戍守甘州，向西擴張了一大片土地。

西元 1031 年（宋仁宗趙禎天聖九年），李德明死，由李元昊嗣立，他外倚契丹，開始規劃脫離宋朝的羈縻，對內則申明號令，以兵部勒各部，黨項進入一個新的境界，西夏國的建立，已是指日可待了。

（本文於 2009 年 10 月 3 日接稿，於 2009 年 11 月 2 日審查通過）

---

<sup>47</sup> 《宋史·夏國傳》。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好報需要時間，惡報只在旦夕。（藏族）

曲解真理，國家遭殃；吞食乾饅，食道受傷。（藏族）

自己釀的酒，不好也得喝。（藏族）

客大了壓主，虎大了傷人。（藏族）

愛情要到花叢裡找，幸福要到民間去尋。（維吾爾族）

好事導向幸福，惡事引往墳墓（維吾爾族）

想死的老鼠，咬著貓尾巴玩。（維吾爾族）

一事做好，能免百難；一事做壞，可招千災。（維吾爾族）

過河莫丟柺杖，相逢莫要撒謊。（彝族）

誠實是立身之本，輕浮是敗事之根。（壯族）

清不過泉水，實不過娃子。（壯族）

即使捨棄性命，也不出賣朋友。（哈薩克族）

正義雖非利劍，卻能戰勝一切。（維吾爾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燕行錄》的傳承

王永一 譯

兼任於國立嘉大、台南科大、臺北市立體院、國立高大等之助理教授

林基中 原著

韓國東國大學校國語國文學科教授；韓國文學研究所所長

### 摘 要

《燕行錄》記錄了朝鮮時代使臣們來往燕京（北京）時的所見所聞，有韓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文物制度、中國人的生活、與中國文士的交流、旅行之中的見聞等，詳細記錄明清時期的中韓關係。這是從古代韓國學者的視野來瞭解中國文化、解讀中國歷史。而現代韓國學者林基中教授主編並鑽研《燕行錄全集》，探究該書傳承的過程與規模。

關鍵詞：燕行錄、燕行錄傳承、明清中韓關係

### 一、前言

《燕行錄》是世界上存在的許多文獻群之中，最具獨特的意義與非常廣泛價值的記錄遺產。《燕行錄》是韓國的使臣們在中國元、明、清三朝時期前往中國的首都，他們所做的事情，所見的，所聞的，所感觸的，所給予的，所接受的，所體驗的諸多事物，具體而具有臨場感的記錄。不僅是東亞，甚至於也是對全世界而言，《燕行錄》是一部重要的記錄遺產。元朝時期，往來於中國的記錄，稱為《賓王錄》，而在明朝時期，往來於中國的記錄多稱為《朝天錄》，在清朝時期，往來於中國的記錄，則多稱為《燕行錄》，所以，《朝天錄》與《燕行錄》的稱呼是爲了要分辨明朝、清朝而使用的書名用語。可是明朝時期，往來中國的記錄，也有稱為

《燕行錄》的書名，共有三種，因此，在此書也有廣義的意義，即在元、明、清三朝時期，往來於中國所描寫的文章都統一稱之為《燕行錄》。因此，在本文所謂《燕行錄》的用語，是韓國人往來於元、明、清三朝所記錄的內容，包含一般紀行錄，也稱為《使行錄》。

《燕行錄》是從高麗到朝鮮王朝為止，共七百多年期間，韓國人們以外交性質的通路，往來於中國，所見所聞的看法與先進文物的體驗而記錄下來，具有自由與創意性的內容。在此，韓國與東亞、東亞與世界外交的關係、正式與非正式的國際、貿易與經濟的狀況、文化交流與尖端學術交流等非常多樣，而且多量的情報資料，以生動的面貌，清楚地記錄下來。

《燕行錄》是到北京的使行路程，包括有諸般使行意識與程式，中國的歷史與傳統、制度、人際交流與文化交流，北京的書籍情報與學術活動，中國的傳統宴會與西洋的最新宴會，北京的西洋文化與西洋書籍，中國與西洋的科學技術，以及民情、風俗、語言、地理等的基本內容所構成的。另一方面，在中國方面的史料記錄之中，卻找不到有關《燕行錄》之中的重要記錄，同時，在中國方面所疏忽的記錄，反而在《燕行錄》當中有著十分詳細而且具體的記錄內容，其存在的數量有不少。因此，《燕行錄》是在東亞任何分野的研究之中，實際而言，是不能不參考的多樣而龐大的記錄報告。

其間，如此的《燕行錄》如何被傳承，關心於此問題的學者有日本學者中村榮孝、夫馬進；韓國學者金聖七、高柄翊、黃元九、全海宗、崔康賢、林基中，以及韓國的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所。由於他們在各自不同關心的領域之中，進行研究，所以，不能掌握整體的傳承規模。如果傳承的實際情形不能適時地掌握，便難以整理出資料，並且，即使是整理出來了資料，如果不能活用，也無法成為圓滿的研究，因此這是具有許多的困難之處。為了想要克服這兩項當務的課題而撰寫本文。

## 二、燕行目的與燕行使

為了把握《燕行錄》的全盤實相，首先，對於燕行的目的、燕行使的構成、燕行次數等的體系，同時，應該細密地執行綜合性的調查才行。在當時期間，如此的問題與相關計量的統計，依照韓國學者的見解，如下列

幾項說明：

全海宗教授認為，從 1637 年至 1894 年為止，朝鮮派遣到清朝的使節團共達到有 607 次。<sup>1</sup>同時，黃元九教授認為，清朝時期只有定期使節的記錄，應該最少也有 249 種以上。<sup>2</sup>如果從全海宗教授的統計數據來看，朝鮮使臣每次前往清朝的時候，其一行人當中，即使只有一個人撰寫《燕行錄》，而只有清代的資料，最少也應該有 607 種的《燕行錄》。而且，依照黃元九教授的調查，朝鮮的定期使節來到清朝應該有 249 次。但是，由於其調查統計的綜合化作業，對於有關值得信賴的具體結果內容，仍在整理當中，尚未完成，因此，爲了《燕行錄》傳承的計量而做推論，這是一種比較實際的方法。

因此，如今從 1271 年到 1893 年為止，調查《朝鮮王朝實錄》、《承政院日記》、《通文觀止》、《同文彙考》、《乘槎錄》、《燕行錄類》、文集類等有關記錄，如：燕行年代、中國的王朝、燕行目的、燕行使的構成等，可以確定元明清三朝的歷代燕行使的活動經過、次數，即爲目前大致整理歸納完成的「歷代燕行使一覽表」，可說是比較完整的資料群，未來也可以追加補強之。<sup>3</sup>如此，可以確認以下的事實。即朝鮮使臣使行於元、明、清的總數是 579 次。如果以時代別而言，元代（1271-1368）只有 1 次。明代（1368-1336）有 82 次，清代（1637-1912）則有 497 次。如果以此統計而言，《燕行錄》最少因該有 579 種以上傳承著。如果每 1 次燕行的時候，就寫兩種程度的《燕行錄》的話，最少也有 1 千餘種的《燕行錄》在傳承著。未來，「歷代燕行使一覽表」補強完整之後，就可以更加正確地尋找《燕行錄》的傳承實際真相。因此，預定大約可以找到 600 餘種的《燕行錄》。

### 三、《燕行錄》的傳承現況

《燕行錄》的傳承現況與其收集、整體現況，考察如下：

<sup>1</sup> 全海宗：《中韓關係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4，頁 194。

<sup>2</sup> 黃元九：〈《燕行錄》研究的課題〉，《韓國文學研究》，第 24 輯，2001，首爾：韓國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

<sup>3</sup> 參見林基中：《燕行錄研究》，首爾：一志社，2006，頁 12-29，「歷代燕行使一覽表」。

筆者近來找到具有獨立性的《燕行錄》，共有 418 件。如果再加上比較不具特色的異本性格的資料，在舉論對象大約有 20 多種，因此，筆者考察了將近 440 多件的《燕行錄》。其中，《燕行錄》的作者被確定的是 418 件，同時，尚未確定的作者有 18 件。可是具有時間資料而展開確認作業的話，大部分的作者是可以確認的。以時代別來看，元代有 1 件，明代有 14 件，清代有 294 件。在此要理解並解釋《燕行錄》的時候，筆者認為一定必須要包含獨立路程期 3 件，跋文類 4 件，獨立別章類 3 件，地圖類 7 件。在此之中，筆者所收集完成的有《燕行錄全集》1-100 卷，<sup>4</sup>以及《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篇》1-3 卷。<sup>5</sup>以上 7 件的資料，必須包含在《燕行錄》的理由是在這分類之中，因為考慮到其資料的活用。假使找出並收錄蔡濟恭的〈題李竹泉航海勝覽圖後〉或吳載純的〈航海朝天圖跋〉，就可以解釋有關與〈航海朝天圖〉四種一樣的幾種疑問事例。

因此，筆者收集並且出版剩餘的韓國所藏未收集本 40 餘件，所找到的資料是可以讓所有學界便於參考。而短篇的燕行詩也逐步在考察中，雖然製作了目錄，但是在 103 卷書的內容大部分都除外。要確定這些類型的資料是應該如何地活用之後，將確定其出版與否。在此次收集整理的《燕行錄》是以別冊來製作解題集，這是優先面對的課題。以及還未找到作者的《燕行錄》，可知有相當數量，爲了《燕行錄》的傳承現況能更加具體地理解，如下統計表的揭示：

---

<sup>4</sup>林基中：《燕行錄全集》，1-100，首爾：韓國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10，25。

<sup>5</sup>林基中、（日）夫馬進：《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1-3，首爾：韓國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2001，11。



	《燕行錄》					作家		時代			異本	合計
	燕行錄 燕行詩	獨立 本路 程記	跋 文	別 章	地 圖	確 認	未 確 認	元	明	清		
								1217- 1368	1368- 1636	1637- 1912		
韓國所 藏本 v.1- ?	342	3	4	3	7	347	12	1	126	233	51	360
日本所 藏本 v.1-3	34	0	0	0	0	32	2	0	3	31	4	34
韓國所 藏未收 集本	42	1	0	0	0	39	4	0	13	30	4	43
合計	418	4	4	3	7	418	18	1	141	294	59	437

#### 四、《燕行圖》與《燕行路程記》

《燕行圖》與《燕行路程記》都是以單行本別冊而傳承的，也有以卷軸方式而傳承的，也有以地圖方式來傳承的，這些都是在《燕行錄》當中可以見到的傳承方式，因此，其傳承的面貌是多樣的。以數量而言，筆者所收集收藏的，也有相當的份量，同時，雖然不能完全收集齊全，但是能把握住其實體也算是不少。因此，筆者雖然以收集本來整理，準備出版著書，但是也須要考察《燕行錄》的傳承問題所在。所以，以概略的舉論來分析之。

《燕行圖》是與《航海朝天圖》（1624，朝鮮仁祖 2 年，明天啓 4 年甲子）或《陸路燕行圖》（1760，朝鮮英祖 36 年，清乾隆 25 年庚辰）等一樣，雖然也有將燕行路程的全貌以圖畫的方式紀錄著，但是與《山海關圖》（未詳）、《瀋陽館圖》（未詳）、《熱河圖》（未詳）、《官城圖》（多種）、《皇都圖》（多種）等一樣，以某種單面的方式浮刻而以圖畫的方式紀錄著。並且，前往朝鮮的中國使臣一行人與類似的類型也有傳承，如同與清國何克敦《奉使圖》一樣的類型。在此之中，將要以《航海朝天錄》來作舉論。此《燕行圖》流傳在國立圖書館有 1 卷，在國立博

物館有 2 卷，在軍事博物館有 1 卷，可是，其《燕行圖》直到目前，仍然無法知道是何時的圖畫，同時，關於其研究，也難以具體地舉論。因此，其重要性的相關資料也難以齊全。而在此之中，筆者在幾年前，整理《燕行錄》之後，蔡濟恭（1720-1799）的《攀巖集》（卷 56）有收錄《題李竹泉航海勝覽圖後》與吳載純（1727-1792）的《醇庵集》有收錄《航海朝天圖跋》<sup>6</sup>。考察了這兩件的跋文之後，《航海朝天錄》是在 1624 年（朝鮮仁祖 2 年，明天啓 4 天甲子），跟隨明朝奏請使行李德洞、吳翮、洪翼漢、蔡濟恭等人前往的畫匠所畫的事實，這是可以確定的。

如此，傳承的《燕行錄》內容與《航海朝天圖》來仔細地比較考查，結果，圖（《航海朝天錄》）與文（洪翼漢、李德洞等的《燕行錄》）的狀況一致而正確。如此的結果，已經在 2001 年 6 月 2 日韓國漢城（首爾）大學校所召開的國語國文學會全國大會之中發表了。<sup>7</sup>前述的《甲子水路朝天錄》是包括有《洪花浦系朝天錄》與《尹白沙系朝天錄》等。同時，有漢文本與韓文本，有《航海朝天圖》與其跋文傳承，而與其他時期的幾種《燕行錄》有所不同，其立體的照明是有可能傳承，這種情形是非常合理的。而且，筆者所找出的兩種跋文之中，特別是吳載純的跋文可說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朝鮮王朝的燕行路程，可以區分為陸路燕行與水路燕行等兩種通路，而且，陸路與水路各自有兩種路線。水路燕行是從 1621 年（朝鮮光海君 13 年，明天啓 1 年）開始的，到了對明外交關係斷絕的 1637 年（朝鮮仁祖 15 年，大金崇德 2 年）為止，一共有 17 年之久，在這時期，與《燕行錄》有重要的關聯記事，筆者將其目錄資料綜合起來整理起來，可說是在學界中是一項創舉。<sup>8</sup>

在此處，有與《朝天錄》、《水路朝天錄》、《竹泉行錄》等相同的韓文版《燕行錄》。此韓文版《燕行錄》全部都屬於《甲子水路朝天錄》中之《洪花浦系朝天錄》。此韓文版《燕行錄》，有必要舉論幾種問題。

<sup>6</sup> 林基中：《燕行錄全集》，1-100，首爾：韓國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10，25。pp.0-451；pp.1-353。

<sup>7</sup> 參照林基中：〈《燕行錄》〉，《2001 年度國語國文學會全國大會發表要旨集》，2001 年 6 月 2 日，首爾：韓國首爾（漢城）大學校。

<sup>8</sup> 參見林基中：《燕行錄研究》，首爾：一志社，2006，頁 49-50。

這舉論的問題是有關於韓文版《燕行錄》存在樣貌的問題、與其作者有關聯的問題、《甲子水路朝天錄》與兩篇跋文與《航海朝天圖》的問題。

首先，是要考察韓文版《燕行錄》的存在樣貌問題。從朝鮮王朝中宗開始，自由地使用韓文書寫的情形，逐漸開始。這是脫離燕山君鎮壓韓文時期，所呈現的自然現象。曾經擔任副使的天坡吳翹在當時 30 歲初半的年紀，是三使之中最爲年輕的一位，也已經體驗了燕京的地方。並且在航海途中，是三使之中，<sup>9</sup>完全沒有暈船的一位。吳翹喜歡占術，也樂於三使職務，因此才氣活潑。同時，燕行的出發或回國都沒有事故而能很平順。他一回國就因爲遭遇到鞫問的波及與被革職的正使李德洞，以及因爲燕行出發時得到重病的蔡裕後等的緣故，突然被拔擢爲書狀官，官途順遂。並且，與正史或書狀官不同，特別重視有關《杜詩諺解》等的韓文書寫。

因此，吳翹撰寫了韓文《燕行錄》，即《朝天諺錄》，展現出其決心，而充分地被認定，除此之外，以《朝天錄》與《水路朝天錄》而言，可看出吳翹爲人切實的一面，記錄了他具體的活動範圍。因此，筆者所見認爲《朝天錄》、《水路朝天錄》、《竹泉李公行蹟》等內容，全都是由吳翹的韓文《燕行錄》，所謂《朝天諺錄》的轉寫異本，這個可能性是極高的。在這些韓文《燕行錄》的成立，可認爲是以洪翼漢的《朝天航海錄》做爲母本的理由。

再者，考察與其作者有關的問題，在洪花浦系《甲子水路朝天錄》認爲，書狀官洪翼漢的《朝天錄》是燕行途中，是他直接寫的（每日記載事實的日記體），而正使李德洞與副使吳翹的《朝天錄》可說是在燕行後而完成的。因此，正使的《朝天錄》，其軍官金汝鐘，副使的《朝天錄》，其軍官金忠甲，對於《朝天錄》的完成，都有所貢獻。同時，正、副使的《朝天錄》可說全部是參考書狀官洪翼漢的《朝天航海錄》。以《朝天錄》與《竹泉李公行蹟》的作者而言，因爲顧慮被鞫問的李德洞，而尋求對策，此一行人回國的時候，首先告知國內的事情，正值往李適之亂時，直奔延曙驛的許僉使兄弟，即許崙、許雋英、許鬥英等三人之中的一人。

現在，提出與《甲子水路朝天錄》、《朝天航海圖》兩篇跋文有關的

<sup>9</sup> 朝鮮使臣使行中國時的上使、副使、書狀官。

問題。即首先以蔡濟恭與吳載純所撰寫的兩篇跋文中所出現的內容而言，有幾項事實整理如下：

第一，對於韓國國立圖書館所藏《燕行圖帖》與韓國國立博物館所藏《航海朝天圖》的整體記錄，以舉論畫本方式來闡明之。<sup>10</sup>

第二，《燕行圖帖》與《航海朝天圖》可知是洪花浦系《甲子水路朝天錄》的水路燕行圖，這是可以確定的。

第三，吳載純寫跋文的當時，即在癸卯年（1784），正使、副使、書狀官各自《航海朝天錄》收藏一冊之其中之一，這是可以確信的。所謂丁亥年（1647），李德洞的模出本一冊之其中之一，這也是可以確信的。

第四，副使吳翹的所藏本是在 1783 年以前已經遺失的，這也是可以確信的。

第五，蔡濟恭撰寫跋文於李德洞的所藏本，另外，吳載純撰寫跋文於洪翼德的所藏本，這是可以確定的。

第六，此二人所撰寫跋文的情事曾經被選出為其燕行的書狀官，蔡裕後的後孫，即蔡濟恭，以及副使吳的後孫，即吳載純，這是具有如此因緣之故，是可以確信的。

第七，韓國國立圖書館所藏《燕行圖帖》，此書原來並不是這個書名，並且，《航海朝天圖》才是當初原來命名的書籍，這是可以確信的。因此，韓國國立圖書館所藏《燕行圖帖》，現在應該稱為《航海朝天圖》。

第八，韓國國立圖書館的《航海朝天圖》以解讀結果來看的時候，曾經搭乘書狀官洪翼漢的船隻的畫員以繪畫的原本，就是洪翼漢所藏本的必然性是最高的。因此，正使李德洞與副使吳翹應該具有模出本，同時，李濟恭也曾經寫過模出本的跋文，以及吳載純也曾經寫過模出本的跋文，這都是可信的。

第九，撰寫過洪翼漢家藏本跋文的吳載純應該是把握住當時情形，而以綜合的方式來構成跋文。如此，闡明瞭事實。因此，韓國國立圖書館的《燕行圖帖》在目前應該得到新的評價。從其稀少性與重要性來看，不論是以寶物或是以國寶來指定，都必須小心翼翼地管理保存。

<sup>10</sup> 參見林基中：《燕行錄研究》，首爾：一志社，2006，頁 52-63，共六幅。

以參考價值而言，一些陸路燕行的圖畫可以簡明地揭示了韓國國立圖書館本《航海朝天圖》的一部分來做解讀與解釋。<sup>11</sup>

《燕行錄》的《路程記》是以獨立本而傳承至今，以及《燕行錄》的附錄被傳承，一共有兩種。前述所屬的是薑栢年（1603-1681）的《燕行路程記》（1660，顯宗一年，順治 17 年庚子）。另外有《甲午朝天路程》（內題：甲午赴京目錄）、《燕行路程記》等同樣的類型。同時，後述所屬的是如與柳寅睦（1839-1900）的《北行歌附路程記》，（1866，高宗 3 年，同治五年丙寅）同類型，而許多都被傳承在《燕行錄》的末尾。關於薑栢年的《燕行路程記》與柳寅睦的《北行歌附路程記》一部，現在都被傳承在《燕行圖》與《燕行路程記》，都具有陸路與海路兩種路線的《燕行圖》。<sup>12</sup>

## 五、結論

關於本文所論述的問題，在此簡要地歸納出以下幾項重點：

第一，爲了把握住《燕行錄》傳承的全盤實相、燕行的目的、燕行使的構成、燕行的次數等相關的調查，而做了分析，其結果，從 1271 年起至 1893 年爲止，從《朝鮮王朝實錄》、《承政院日記》、《通文館志》、《同文彙考》、《乘槎錄》、《燕行錄類》、《文集類》等史料之中構成三使的相關記錄來調查的話，朝鮮使臣使行至元、明、清三朝的總次數，共有 579 次。以時代別來考察的話，元代（1271-1368）有 1 次，明代（1368-1636）有 82 次，清代（1637-1912）有 497 次。如果以通路來看，《燕行錄》應該最少有 579 種以上被承傳著。

第二，考察《燕行錄》的傳承現況與其收集、整理現況，其結果，具有獨立性的《燕行錄》全部共有 418 件。如果再加上異本性質的《燕行錄》的話，大約有 440 餘件被傳承著。其中，《燕行錄》的作者，可以清楚地被確認的，共有 418 件。如果以時代別來看，元代有 1 件、明代有 141 件、清代有 294 件。至今被確認的韓國所藏未收集本共有 40 餘件。

<sup>11</sup> 參見林基中：《燕行錄研究》，首爾：一志社，2006，頁 65-66（共四幅，韓國崇實大學校珍藏）。

<sup>12</sup> 參見林基中：《燕行錄研究》，首爾：一志社，2006，頁 68-83。

第三，《燕行圖》與《燕行路程記》是以單行本別冊來傳承的，並且以捲軸的形式傳承的、也有以地圖的形式傳承的、也有以畫本形式傳承的。以及附在《燕行錄》之中傳承的。因此，其傳承的樣貌是多樣的。

《燕行錄》是與《航海朝天圖》（1624，朝鮮仁祖 2 年，明天啓 4 年甲子）或《陸路燕行圖》（1760，英祖 36 年，乾隆 25 年庚辰）等一樣將燕行路程的全貌以圖畫畫出的，但是，也有與山海關圖（未詳）、瀋陽館圖（未詳）、熱河圖（未詳）、宮城圖（多種）、皇都圖（多種）等一樣，浮刻某種單方面的圖畫。而且，與來到朝鮮的中國使臣一行所畫的清朝何克敦的《奉使圖》一樣，被傳承著。

《航海朝天圖》是收錄在蔡濟恭（1720-1799）《攀巖集》的《題李竹泉航海勝覽圖後》，以及收錄在吳載純（1727-1792）《醇庵集》的《航海朝天圖跋》兩者都是相同的跋文而以圖別方式傳承著。《航海朝天圖》是在 1642 年（朝鮮仁祖 2 年，明天啓 4 年甲子），前往明朝的奏請使行，即隨著李德沔、吳翬、洪翼漢、蔡濟恭等人而前往的某些畫員所畫的圖本，這是可以確信的史實。

《甲子水路朝天錄》就是《洪花浦系朝天錄》與《尹白沙系朝天錄》，同時有漢文本與韓文本。《航海朝天圖》與其跋文被傳承著，與其他時期的幾種《燕行錄》有所不同，可以呈現立體的照明，乃是其傳承的特色。但是，韓文本的《朝天錄》、《水路朝天錄》、《竹泉行錄》等《燕行錄》全部都是屬於《甲子水路朝天錄》之中的《洪花浦系朝天錄》。

第四，考察韓文本《燕行錄》的存在面貌，其結果如下：

《朝天錄》、《水路朝天錄》、《竹泉李公行蹟》全部都是天坡吳翬的韓文版《燕行錄》，所謂是為《朝天諺錄》的轉寫異本的可能性是很高。在這些韓文版《燕行錄》的成立，可以具體的說明是洪翼漢《朝天航海錄》的母本。在洪花浦系《甲子水路朝天錄》，書狀官洪翼漢的《朝天錄》應該是在燕行途中親自寫成的。同時，正使李德沔與副使吳翬的《朝天錄》則是完成燕行之後才寫成的。因此，正使的《朝天錄》其軍官金汝鐘，副使是《朝天錄》而且其軍官金忠甲，兩者多少都是受到矚目的。並且，這個正、副使的《朝天錄》可說是全部都是參考書狀官洪翼漢的《朝

天航海錄》。以《朝天錄》與《竹泉李公行蹟》的作者而言，擔心李德洵的鞫問，想要摸索其對策，這些一行人回國的時候，最先想要將國內情事告知。而跑至宴書驛的許僉使兄弟，即可推測是許崙、許雋英、許鬥英等三人之中的一人。

第五，對於《甲子水路朝天錄》與兩篇跋文，以及《航海朝天圖》的問題，考察其結果如下：

關於韓國國立圖書館所藏《燕行圖帖》與韓國國立博物館所藏《航海朝天圖》，其傳承過程與製作年代等，是詳細而可以得知的。即《燕行圖帖》與《航海朝天圖》是洪花浦系《甲子水路朝天錄》的水路燕行圖。吳載純欲寫跋文的當時，即在癸卯（1784）年，正使、副使、書狀官各自所藏《航海朝天圖》各一冊。可知所謂丁亥（1647）年，李德洵的模出本 1 冊就是其中之一本，副使吳翹的所藏本是在 1783 年以前就已經遺失了，這是可以確信的。李濟恭在李德洵的所藏本之中撰寫跋文，同時，吳載純在洪翼漢的所藏本之中，也撰寫跋文的事實都是可以確信的。

這兩人所寫的跋文是曾經被選為燕行的書狀官，即蔡裕後的後孫，蔡濟恭。

以及副使吳翹的後孫，吳載純等的緣故。韓國國立圖書館所藏《燕行圖帖》並非此書本來的名字，同時，最初是命名為《航海朝天圖》，才是本來的名字。因此，韓國國立圖書館所藏《燕行圖帖》才是現在《航海朝天圖》的正確書名。以韓

國國立圖書館的《航海朝天圖》到現在所進行解讀結果來看，曾經搭乘書狀官洪翼漢的船隻的畫員所畫的原本，可說是洪翼漢所藏本的必然性最高。因此，正使李德洵與副使吳翹，應該都是具有模出本的形式，同時，蔡濟恭在其模出本撰寫跋文，並且吳載純在原本也撰寫跋文，這都是可以確信的。可知吳載純在洪翼漢的家藏本撰寫跋文，是以如此綜合的方式來構成跋文。

## 六、《燕行錄全集》的編纂意義

《燕行錄全集》是由韓國東國大學校教授林基中主編的，共一百冊，該校出版部出版，內容記錄了朝鮮時代使臣們來往燕京（北京）時所見所

聞的紀行錄。這些朝鮮使臣們通精通中國文化，中國語文流利，能撰寫中文。這些記錄不僅僅是燕行使節的個人遊記，更是探索東亞地區政治、經濟、社會、學術、文化等領域之龐大而珍貴的史料寶庫。例如：燕行錄收錄了大量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百態生動有趣的記載，均未見於同時代的中國史籍。擔任燕行的使節屬於朝鮮時代的支配階級，是提供朝鮮統治哲學觀念基礎的優秀集團，他們把出使期間的種種經歷詳細地記錄流轉下來，這種類型的記錄不僅在東亞，就是在世界上也很難找出類似的具有特殊性格的資料。誠如編者所言，《燕行錄全集》的編纂不僅對東亞外交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中韓兩國關係的更好發展也有所貢獻。也對於研究中韓兩國的歷史、文學、中韓關係史以至東亞地域史、世界文明史，都有極高的參考價值，是不可或缺的學術叢書。<sup>13</sup>

（本文於 2009 年 2 月投稿，於 2009 年 10 月 30 日審查通過）

## 六、參考書目

林基中：《燕行錄研究》，首爾：一志社，2006。

全海宗：《中韓關係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4。

黃元九：〈《燕行錄》研究的課題〉，《韓國文學研究》，第 24 輯，2001，SEOUL：韓國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

林基中：《燕行錄全集》，1-100，首爾：韓國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10，25。

林基中、（日）夫馬進：《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1-3，首爾：韓國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2001，11。

林基中：〈《燕行錄》〉，《2001 年度國語國文學會全國大會發表要旨集》，2001 年 6 月 2 日，首爾：韓國首爾（漢城）大學校。

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圖書館：《燕行錄》

[http://www.cityu.edu.hk/lib/about/event/cul\\_korea/collection-yon-chi.htm](http://www.cityu.edu.hk/lib/about/event/cul_korea/collection-yon-chi.htm)

<sup>13</sup> 譯者補充「《燕行錄全集》的編纂意義」，引自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圖書館網頁一文：[http://www.cityu.edu.hk/lib/about/event/cul\\_korea/collection-yon-chi.htm](http://www.cityu.edu.hk/lib/about/event/cul_korea/collection-yon-chi.htm)



## 《詩經》中有關邊族紀錄的探討

張華克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生

### 摘 要

《詩經》中有部分作品是與邊疆民族有密切關係的。本文摘出《雅》中有鬼方、玁狁等內容的四篇詩篇：〈蕩〉、〈采薇〉、〈出車〉、〈六月〉等，全文翻譯成白話，並分析當時邊疆民族對周朝的影響，並且討論鬼方、玁狁是否為匈奴的先世？《詩經》可稱為史料還是史著？等相關問題。

關鍵字：《詩經》、鬼方、玁狁、匈奴、長城、史料、史著。

### 一、前言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選集，共有詩歌三百零五篇，因常取整數稱呼，所以又稱為「詩三百」。《詩經》收集了從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約五、六百年間黃河、長江流域各國詩歌，既是中國文學的濫觴，其內容也是研究商周歷史文化、社會民俗、文字音韻的寶貴文獻。

本文所要探討的內容，都是與邊疆民族紀錄有關聯的重要史詩，包含：〈蕩〉、〈采薇〉、〈出車〉、〈六月〉等四篇，而且全是從《雅》這個部分所摘錄出來的。

所謂的《雅》，分為《大雅》與《小雅》，是組成《詩經》內容的一部分。《詩經》常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此為四始。「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賦、比、興」則是《詩經》的表現手法。

《雅》是指人人能懂的典雅音樂。《詩經》的《雅》共有一百零五篇，分爲《大雅》卅一篇和《小雅》七十四篇。《雅》多數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歌。內容幾乎都是關於政治方面的，有讚頌好人好政的，有諷刺弊政的。只有幾首表達個人感情的詩，但是沒有《詩經》中常見的情詩。

〈蕩〉、〈采薇〉、〈出車〉、〈六月〉等四篇詩篇，〈蕩〉的原文「內燠於中國，覃及鬼方。」提到了「鬼方」，而〈采薇〉的「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出車〉的「赫赫南仲，玁狁於夷。」、「〈六月〉的「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等三篇原文，都提到了「玁狁」。由於上古時代這類資料並不多見，相對來說，《詩經》中所有的算是相當豐富的了，是當時涉及邊疆民族的珍貴文獻，值得我們深入瞭解，現在就逐一加以介紹並探討之。

不過由於《詩經》年代久遠，文字古樸，詩又有各自的背景，宗旨難解。所以本文加以語譯，務求與讀者能夠準確的溝通，翻譯所根據的主要參考資料是：滕志賢譯《新譯詩經讀本》（上、下冊）<sup>1</sup>及（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上、下冊）<sup>2</sup>、（清）焦循撰《毛詩補疏》五卷<sup>3</sup>等三種。另外爲了討論方便，每首詩都加上了章節編號，使讀者搜尋起來更爲簡便。

## 二、《詩經》四篇詩篇的原文、語譯及相關邊疆民族評介

（一）、第一篇是「大雅·蕩」，其原文及語譯揭示如下：

章節	大雅·蕩 原文	語譯
一	蕩蕩上帝， 下民之辟。 疾威上帝， 其命多辟。	至高無上的上帝， 他是天下百姓的主君。 如今上帝暴虐， 他的旨意多邪僻。

<sup>1</sup> 滕志賢，《新譯詩經讀本》，出版項臺北市：三民，民 89[2000]。

<sup>2</sup> 王先謙，（清）撰，《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出版項臺北市：明文，民 77[1988]。

<sup>3</sup> （清）焦循撰《毛詩補疏》五卷，出版項北京：學苑，2003。

章節	大雅·蕩 原文	語譯
	天生烝民， 其命匪諶。 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雖然上帝降生眾多百姓， 但是天命不能完全相信。 事事都有良好的開頭， 卻很少有完美的結局。
二	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 曾是強禦， 曾是掊克， 曾是在位， 曾是在服。 天降滔德， 女興是力。	文王嘆說：「唉！ 唉，你這殷商的君王！ 竟然如此強暴專橫！ 竟然如此吹噓逞能！ 竟然如此處在高位！ 竟然如此掌握職權！ 上天賦予你傲慢的德性， 你推波助瀾特別起勁。」
三	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 而秉義類， 強禦多懟。 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 侯作侯祝， 靡屆靡究。	文王嘆說：「唉！ 唉，你這殷商的君王！ 你應當任用好人， 強橫的人會召來許多怨恨。 他們用謠言來應對， 在內部巧取豪奪。 又是謾罵又是詛咒， 吵吵鬧鬧沒完沒了。」
四	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 女無咎於中國， 斂怨以爲德。 不明爾德， 時無背無側； 爾德不明， 以無陪無卿。	文王嘆說：「唉！ 唉，你這殷商的君王！ 你在國內怒吼發威， 把積怨當成了美德。 不能使你的德行光明， 於是前後左右沒有可靠的人； 你的德行不光明， 因此沒有輔佐的臣子。」

章節	大雅·蕩 原文	語譯
五	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 天不湏爾以酒， 不義從式。 既愆爾止， 靡明靡晦。 式號式呼， 俾晝作夜。	文王嘆說：「唉！ 唉，你這殷商的君王！ 上天不讓你沈迷在酒裡， 不讓你效法不良的習氣。 但你使自己犯下錯誤， 縱樂不分白天黑夜； 你們又喊又叫， 把白天也當作黑夜。」
六	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 如蜩如蟴， 如沸如羹。 小大近喪， 人尙乎由行。 內燬於中國， 覃及鬼方。	文王嘆說：「唉！ 唉，你這殷商的君王！ 到處像蟬兒在鬧騰， 到處像開水和熱湯。 大官小吏一切都快淪喪， 你還在沿老路向前闖。 你在國內激起了憤怒， 還波及到偏遠的國度鬼方。」
七	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 匪上帝不時， 殷不用舊。 雖無老成人， 尙有典刑。 曾是莫聽， 大命以傾。	文王嘆說：「唉！ 唉，你這殷商的君王！ 不能怪上帝心不善良， 是你拋棄了傳統典章。 即使沒有德高望重的老臣， 也還有典章和法度。 你竟然聽不進這些， 國家命運因而顛覆。」
八	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 人亦有言： 顛沛之揭， 枝葉未有害，	文王嘆說：「唉！ 唉，你這殷商的君王！ 人們早就說過， 大樹倒地根朝天， 枝葉雖然還沒傷，

章節	大雅·蕩 原文	語譯
	本實先撥。	樹根實在已損壞。
	殷鑒不遠，	殷商這面鏡子並不遠，
蕩	在夏後之世！	就在那夏桀的時代。」

這篇詩假託文王責商紂，諷刺厲王敗政亂國。《詩序》雲：「〈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全詩共分八章。首章言上帝暴虐，天命無常，實為暗斥厲王。這是全篇的總提綱。二至八章，都是文王指責商紂的話：二章責商紂強橫貪暴。三章責商紂排斥賢良。四章責商紂驕橫自恣，不修明德，以致眾叛親離。五章責商紂沈湎於酒。六章責商紂一意孤行，民怨沸騰，內憂外患。七章責商紂廢棄先王舊典，拒絕勸諫。八章以樹倒根先壞，喻殷商亡國之先，國本已絕。全詩以「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作結，暗示詩人作詩本意在於警告厲王，當以殷商為鑒。

其中第六章「內燠於中國，覃及鬼方。」提到了「鬼方」，是我們探討的重點。「燠」（音必），意思是憤怒。語譯說「你在國內激起了憤怒，還波及到偏遠的國度鬼方。」

鬼方，位於今陝西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內蒙古西部，古代中國北方游牧族之一，是商朝時期的外患。《易卦·爻辭》上說：“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

王國維所著「鬼方混夷獫狁考」說明<sup>4</sup>：

我國古時，有一彊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隴環中國而北，東及太行、常山間，或分或合，時入侵暴中國。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程度不及諸夏遠甚。又本無文字，或雖有而不與中國同。是以中國之稱之也，隨世異名，因地殊號，至於後世，或且以醜名加之。其見於商周間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獫狁。其在宗周之季，則曰獫狁。入春秋後，則始謂之戎，繼號曰狄。戰國以降又稱之曰胡，曰匈奴。綜上諸稱觀之，則曰戎曰

<sup>4</sup> 王國維，《觀堂集林》出版項上海市：上海書店，1992，卷十三，史林五，「鬼方混夷獫狁考」，頁一。

狄者，皆中國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獫狁、曰玁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為中國所附加。當中國呼之為戎狄之時，彼之自稱決非如此，其居邊裔者，尤當仍其故號，故戰國時中國戎狄既盡，強國辟土，與邊裔接，乃復以其本名呼之。此族春秋以降之事，載籍稍具，而遠古之事，則頗茫然，學者但知其名而已。

王氏將這些繁雜的稱謂，做了系統化的考證功夫。於是讓人瞭解，鬼方又作鬼戎，殷周間的鬼方已以媿為姓。混夷又稱作昆戎，就是獫狁（音預）、玁狁、胡、匈奴。又文中所說「汧隴」，指的是陝西省隴縣，也就是汧（音千）水的發源地。

（二）、第二篇是「小雅·采薇」，其原文及語譯揭示如下：

章節	小雅·采薇 原文	語譯
一	采薇采薇！ 薇亦作止。 曰歸曰歸！ 歲亦莫止。 靡室靡家， 玁狁之故； 不遑啓居， 玁狁之故。	採薇菜，採薇菜， 薇菜正破土而出。 回家吧，回家吧， 又到了年尾歲末。 彷彿沒有妻子家庭， 這是玁狁來犯的緣故。 沒有閒暇在家安居， 這是玁狁來犯的緣故。
二	采薇采薇！ 薇亦柔止。 曰歸曰歸！ 心亦憂止。 憂心烈烈， 載饑載渴； 我戍未定， 靡使歸聘。	採薇菜，採薇菜， 薇菜正柔嫩。 回家吧，回家吧， 心中多麼憂悶。 憂心如火燒焚， 又飢餓又乾渴。 我的駐地尚未確定， 不能託人回家探問。

章節	小雅·采薇 原文	語譯
三	采薇采薇！ 薇亦剛止。 曰歸曰歸！ 歲亦陽止。 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 憂心孔疚， 我行不來。	採薇菜，採薇菜， 薇菜已經又老又粗。 回家吧，回家吧， 已經到了初冬十月。 兵役沒有休止， 沒有閑暇在家安住。 心中憂悶，十分痛苦， 我出征不能回來。
四	彼爾維何？ 維常之華。 彼路斯何？ 君子之車。 戎車既駕， 四牡業業； 豈敢定居， 一月三捷。	那盛開的是什麼花？ 是棠棣開的花。 那高大的車是什麼車？ 是將帥乘的戰車。 戰車已經套上了馬， 四匹公馬多高大。 哪敢住下歇一歇？ 一個月三戰三捷。
五	駕彼四牡， 四牡騤騤； 君子所依， 小人所腓。 四牡翼翼， 象弭魚服； 豈不曰戒， 玁狁孔棘。	駕著那四匹公馬， 四匹公馬多強壯。 將帥靠在戰車上， 士卒掩蔽在戰車旁。 四匹公馬步伐整齊， 象牙飾弓，魚皮箭袋。 怎敢不天天警戒？ 獯狁來犯軍情緊急。
六	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 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	從前我出征呀， 楊柳搖曳。 如今我歸來呀， 大雪紛飛。 走在路上步子緩慢，

章節	小雅·采薇 原文	語譯
	載渴載饑；	又乾渴又飢餓。
	我心傷悲，	我心中多麼悲傷，
采薇	莫知我哀！	沒有人知道我的悲哀。

全詩共分為六章，前三章形式複疊。詩人採用倒敘筆法，前五章都是追述的言詞。前面一、二、三三章是追述出戍的原因以及久戍思歸的憂傷，每章章首都有「采薇采薇！」的句子以暗示在家務農的情景，而出征不能回來，導致薇菜已經又老又粗。這個現象在首章是「作止」、二章是「柔止」、三章則已是「剛止」節節遞進，以薇菜生長變化暗示出戍日久，精妙異常。四、五兩章追述戍邊禦敵情景。「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抒寫士氣高昂，戰果輝煌；「四牡翼翼，象弭魚服」，形容將士威武風采；「豈不日戒？玁狁孔棘」，寫既勝而戒備，軍中整肅可見。六章算是結尾，描寫歸途時景物迥異，不禁黯然神傷，引人同情。尤其是「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氣氛感人，東晉謝玄稱這是《詩經》中最好的詩篇。

這篇詩誕生的背景是在西周中期，時為西元前 828 年至西元前 782 年間周宣王主政時期，當時玁狁強盛，移居於焦獲，又由焦獲南侵，至於鎬、朔方及涇陽，直接威脅到周室，周宣王命大將南仲率師北征，並築城於朔方。《詩經·采薇》就是描述當時周王朝與玁狁作戰情況和士兵的艱苦戰鬥生活景象：“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學者林幹把這段詩的「玁狁」當成是「匈奴族的來源及其形成」的一項記載<sup>5</sup>。但是劉義棠氏則認為，「匈奴的先世，因資料貧乏，已不可考<sup>6</sup>。」那麼，玁狁跟匈奴的關係到底如何？王鍾翰主編的《中國民族史》有一番說明<sup>7</sup>：

<sup>5</sup> 林幹著，《匈奴史》，出版項呼和浩特市：內蒙古人民，2007，頁 1。

<sup>6</sup> 劉義棠著，《中國邊疆民族史》，出版項臺北市：台灣中華，民 71[1982]版本項三版(修訂本)，頁 37。

<sup>7</sup> 王鍾翰主編《中國民族史》，出版項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4，頁 215-216。



匈奴族源，從其名稱由來便可看出，他們與殷周以來的鬼方、獯鬻、葷粥、獫狁、胡等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但不等於說，前者是後者的翻版，而是說，匈奴族是在上述諸族的基礎上，吸收周遭各族民眾發展起來的。著名民族史專家馮家昇在《匈奴民族及其文化》一文中，曾列舉匈奴異名 32 種，計有鬼方、鬼戎、魋方、戈鬼方、畏夷、隗國、混夷、混戎、犬戎、獯允、獯鬻、葷粥、葷庾等諸名目，雖不完全是確指同一族體，但與匈奴族有關則似無可非議。在匈奴共同體中，見諸記載的就有休屠（屠各）、宇文、獨孤、賀賴、羌渠等部。其下，還有眾多氏族，如攀輓氏（虛連題氏）、呼延氏（呼衍氏）、蘭氏、須蔔氏、丘林氏、喬氏、當於氏、韓氏、栗籍氏、沮渠氏等諸姓。因此，完全可以說，它是由戎、狄、胡多種民族成分組成的「民族共同體」。

也就是說，獯鬻跟匈奴確實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但是因為資料貧乏，所以不能肯定的說，匈奴是獯鬻的翻版，而只能說，匈奴族是在鬼方、獯鬻、葷粥、獫狁、胡等諸民族的基礎上，吸收周遭各族民眾發展起來的。

（三）、第三篇是「小雅·出車」，其原文及語譯揭示如下：

章節	小雅·出車 原文	語譯
一	<p>我出我車， 於彼牧矣！ 自天子所， 謂我來矣！ 召彼僕夫， 謂之載矣！ 王事多難， 維其棘矣！</p>	<p>我出動我的兵車， 從那遠郊呀。 我宣告，從天子那裏， 受命而來呀。 召集那些車伕， 叫他們載上將士呀。 王朝多患難， 情勢是那樣緊急啊。</p>
二	<p>我出我車， 於彼郊矣！</p>	<p>我出動我的兵車， 從那近郊呀。</p>

章節	小雅·出車 原文	語譯
	設此旐矣，	樹起這龜蛇旗呀，
	建彼旐矣！	掛上那旐牛尾呀。
	彼旐旐斯，	那老鷹旗和龜蛇旗喲，
	胡不旆旆？	怎麼不迎風飄揚？
	憂心悄悄，	我憂心忡忡，
	僕夫況瘁。	車伕也勞累憔悴。
三	王命南仲，	天子命令南仲，
	往城于方；	前往北方修築城牆。
	出車彭彭，	兵車出動聲勢壯大，
	旗旐央央。	交龍旗和龜蛇旗鮮亮。
	天子命我，	天子命令我，
	城彼朔方。	去那北方修築城牆。
	赫赫南仲，	聲名顯赫的南仲，
	玁狁於襄。	驅除入侵的玁狁。
四	昔我往矣，	當初我出征時呀，
	黍稷方華；	黍稷正抽穗揚花。
	今我來思，	如今我回來喲，
	雨雪載塗。	飄雪已經滿路。
	王事多難，	王朝多患難，
	不遑啓居。	沒有閒暇安居。
	豈不懷歸？	難道不想回家？
	畏此簡書。	怕這傳達王命的文書。
五	嘒嘒草蟲，	草蟲嘒嘒鳴叫，
	趯趯阜螽。	蝗蟲上下跳躍。
	未見君子，	沒有見到夫君，
	憂心忡忡；	我憂心忡忡。
	既見君子，	已經見到夫君，
	我心則降。	我的心就放下。
	赫赫南仲，	聲名顯赫的南仲，

章節	小雅·出車 原文	語譯
六	薄伐西戎。	奮力征伐西戎。
	春日遲遲，	春天白日漫長，
	卉木萋萋；	草木蔥翠茂盛。
	倉庚喈喈，	黃鶯唧唧歡叫，
	采芣祁祁。	採芣姑娘多如浮雲。
	執訊獲醜，	抓舌頭，俘眾敵，
出車	薄言還歸。	凱旋回歸。
	赫赫南仲，	聲名顯赫的南仲，
	玁狁於夷。	平定了玁狁。

本詩共分成六章。第一、二兩章述南仲奉天子之命出車征伐玁狁。其中的「我」，指的是南仲自己。第三章詩人自述受命於天子，去那北方修築城牆，以輔佐南仲。四章抒寫詩人歸途心境。其中的「我」，指的是詩人自己。五、六兩章敘述征人的室家企盼征人平定玁狁，得勝回歸。

《出車》一詩，通過對周宣王初年討伐玁狁勝利的歌詠，熱情頌揚了統帥南仲的英明和戰功，表現出中興君臣對建功立業的自信心。這篇詩不只是稱贊了大將南仲帶兵抵禦玁狁，勤勞王事，克敵有功，詩中還描寫了將士辛苦轉戰，不得休息，同時也寫了眷屬希望征人凱旋榮歸的心情。劉學鈞著《匈奴史論》中認為《出車》一詩，「記述周宣王時，匈奴與周之戰事<sup>8</sup>。」劉認為玁狁就是匈奴，因為「周人稱匈奴為玁狁<sup>9</sup>。」

前面提過，《出車》一詩第三章詩人自述受命於天子，到北方修築城牆，以輔佐南仲，才有「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的詩句。這裡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訊息，就是周宣王時代，為了維護國防，需要大舉修築北方的邊牆。第三章中還有「王命南仲，往城于方；」的句子，也是在說修城牆。其實我們還可以從後來的《史記》中得到佐證<sup>10</sup>：

<sup>8</sup> 劉學鈞著，《匈奴史論》，出版項臺北市：南天，民 76[1987]，頁 32。

<sup>9</sup> 劉學鈞著，同註 8，頁 31。

<sup>10</sup> (漢)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出版項臺北市：啓明，民 55[1966]，卷一百十「匈奴列傳」，頁 923-924。

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裏。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穀、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

也就是說，在戰國時代七雄中的秦、趙、燕三國，凡是與匈奴邊境接壤的，都會築長城以自保，那麼再回頭看周人築城防備獫狁的舉動，就不會感到有什麼奇怪的地方了。

（四）、第四篇是「小雅·六月」，其原文及語譯揭示如下：

章節	小雅·六月 原文	語譯
一	六月棲棲， 戎車既飭。 四牡騤騤， 載是常服。 玁狁孔熾。 我是用急。 王於出征， 以匡王國。	六月裏檢閱正忙， 戰車已經整修停當。 四匹公馬強壯， 載上這些戎裝。 玁狁太猖狂， 我軍進入緊急狀態。 我奉王命出征， 來挽救王國危亡。
二	比物四驪， 閑之維則。 維此六月， 既成我服。 我服既成， 於三十裏。 王於出征， 以佐天子。	挑選等力的四匹黑馬， 訓練牠們很有章法。 在這盛夏六月， 製成了我的戰服。 我的戰服已經製成， 每日行軍三十裏路。 我奉王命出征， 來把天子輔助。
三	四牡修廣，	四匹公馬體長背寬，

章節	小雅·六月 原文	語譯
	其大有顙。	魁梧高大。
	薄伐玁狁，	討伐玁狁，
	以奏膚公。	來進獻大功。
	有嚴有翼，	威嚴謹慎，
	共武之服。	盡力完成戰鬥任務。
	共武之服，	盡力完成戰鬥任務，
	以定王國。	來安定我們王國。
四	玁狁匪茹，	玁狁不自度量，
	整居焦獲。	全部佔據焦獲，
	侵鎬及方，	又侵犯鎬和方，
	至於涇陽。	一直深入到涇水北方。
	織文鳥章，	旗幟上畫著飛鷹，
	白旆央央。	白色鑲邊多麼鮮亮。
	元戎十乘，	大型戰車十輛，
	以先啓行。	在前頭開道衝鋒。
五	戎車既安，	戰車穩穩當當，
	如輕如軒。	既像重車又像輕車一樣。
	四牡既佶，	四匹公馬健壯，
	既佶且閑。	健壯而且訓練有素。
	薄伐玁狁，	討伐玁狁，
	至於太原。	一路驅逐到太原。
	文武吉甫，	吉甫文武雙全，
	萬邦爲憲。	萬國引爲典範。
六	吉甫燕喜，	吉甫高興喜悅，
	既多受祉。	接受天子賞賜多多。
	來歸自鎬，	從鎬地回來，
	我行永久。	我在路上走了很久。
	飲禦諸友，	給各位朋友進酒，
	炰鱉膾鯉。	有清蒸甲魚和切片鯉魚。

章節	小雅·六月 原文	語譯
	侯誰在矣？	誰在座中？
六月	張仲孝友。	孝順善良的朋友張仲。

「六月」這篇詩記敘的是周宣王北伐玁狁的事蹟，其主要目的是透過對這次戰爭勝利的描寫，讚美宣王時的中興功臣也就是這次周朝的主帥尹吉甫。由於尹吉甫的文韜武略、指揮若定，才能讓萬國引為典範。

全詩一共有六章。前三章敘述敵人之氣焰囂張，我之備戰緊張有序：「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四、五兩章述敵入侵之深，吉甫帥師出擊，旗開得勝：「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末章述吉甫凱旋歸宴私第，菜單有有清蒸甲魚和切片鯉魚。：「飲饗諸友，炰鱉膾鯉。」

「六月」這篇詩中的句子「薄伐玁狁，至於太原」，也成為學者王國維當作考證的依據。王國維於觀堂集林中稱<sup>11</sup>：

犬戎之名，始見於左傳、國語、山海經、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皆春秋戰國以後呼昆夷之稱，而獯鬻、玁狁亦被此名，後漢書西羌傳稱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遷於岐下，是以獯鬻為犬戎也，後漢書西羌傳引紀年，穆王西征犬戎，取其五王，王遂遷戎於太原，又引夷王命虢公帥六師伐太原之戎，又引宣王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而詩雲：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太原一地，不容有二戎，則又以玁狁為犬戎也；由是觀之，古之獯鬻、玁狁，後人皆被以犬戎之名，則攻幽王滅宗周之犬戎，亦當即宣王時之玁狁。

### 三、《詩經》的史學分類探討

清代章學誠創「六經皆史」之說，把《詩經》從理學家所說的「載道之書」牽引到史學的領域來，他指出六經是「史」，而且原來還是「先王之政典」<sup>12</sup>：

<sup>11</sup> 同註 4，頁十二。

<sup>12</sup> (清)章學誠撰；國史研究室編，《文史通義》，出版項臺北市：史學，民 63[1974]，四版，頁 1。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聞命矣；易以道陰陽，願聞所以為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

如周佳榮更指出，章氏把史籍區分為撰述與記注兩類<sup>13</sup>。章氏認為史學必具「史意」，惟具史意方可謂著述。史意即史家著述之微旨。著述或稱「撰述」，是指有觀點、有材料、有分析的著作；資料的纂輯，則稱比類或「記注」。兩者相輔為用，缺一不可。

《詩經》之所以能夠稱為「史」，據金毓黻推測章氏的想法是「以為詩三百篇，悉出史官之所錄」<sup>14</sup>。史官寫的當然就是「史」，那麼《詩經》是屬於章氏所說撰述與記注的中哪一類「史」呢？金毓黻認為，《詩經》只能稱為史料（記注），不能稱為史著（撰述）<sup>15</sup>：

是故謂尚書、春秋為史，可也，謂易、詩、禮、樂為史，不可也，謂易、詩、禮、樂為史料，可也，逕謂為史著，不可也，此吾夙日所持之論也。

其實金毓黻的講法是值得商榷的，就以本文所引的四篇史詩：〈蕩〉、〈采芣〉、〈出車〉、〈六月〉等，哪一篇不是合乎「有觀點、有材料、有分析的著作」的標準呢？既然如此，就可以稱為「撰述」了，堅持稱作史料（記注），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

#### 四、結語

（一）、《詩經》以往給人文學性很強的印象，孔子甚至說「不學詩，無以言」<sup>16</sup>，顯示出《詩經》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深刻影響。然而〈蕩〉、〈采芣〉、〈出車〉、〈六月〉等四篇詩，史學性更強，有諷刺厲王敗政亂國的〈蕩〉，有描述周朝與玁狁作戰情況和反映士兵的艱苦戰鬥生活景象的〈采芣〉，有紀錄周宣王時代，為了維護國防，修築北方的

<sup>13</sup> 周佳榮著，《中國史學名著概說》，出版者：唐山，民 78，頁 75。

<sup>14</sup> 金毓黻著，《中國史學史》，出版項[臺北市]：鼎文，民 94[2005]，九版，頁 280。

<sup>15</sup> 同註 14。

<sup>16</sup> (宋)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出版項臺北市：世界書局，民 62[1973]，八版，〈論語〉季氏篇第十六，頁 117。

邊牆的〈出車〉，加上記敘周宣王北伐玁狁事蹟的〈六月〉，使讀者對周朝因邊族入侵而產生的悲歡離合、人生百態有歷歷如繪的生動感受。如果只把《詩經》當成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那就是太小看這本書了。

（二）、鬼方、玁狁是否為匈奴的先世？《詩經》中雖然多次提及鬼方、玁狁，是相當可貴的史料。但是上古史資料片段而不連續，加上經歷的時間又極長，實在並不足以準確判斷。本文引用了王國維、林幹、劉義棠、王鍾翰、劉學銑等學者專家的看法，希望對讀者在這個問題上能有所啓迪。

（三）、自清代章學誠創「六經皆史」之說以後，《詩經》的史學價值就逐漸受人重視了。本文認為金毓黻在其所寫《中國史學史》中把《詩經》分類為史料（記注），而不能稱為史著（撰述）的講法是有些疑問的。因為從本文所選用的四篇史詩觀察，不只是合乎「有觀點、有材料、有分析」的史學著作標準，而且在文學方面也是「有感情、有文采、有韻律」的，很多正史也達不到這種水準，因此其評價實在是可以稱為「撰述」中的傑作了。如果只將它們當成較單純的史料（記注）來看，是不是有些過於貶抑先賢們的心血結晶了？

（本文於 2009 年 9 月 11 日投稿，於 2009 年 10 月 14 日審查通過）



## 新疆維吾爾古典音樂木卡姆

周菁葆

海口經濟技術學院藝術研究所所長、教授

### 摘 要

木卡姆是伊斯蘭諸國現存在的一種音樂文化，維吾爾木卡姆則是其中較為豐富的一種。長期以來，人們以為只有一種木卡姆，其實，維吾爾木卡姆有多種形式。而且其音樂形式與內容非常豐富。維吾爾木卡姆是東方藝術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

關鍵字：維吾爾 古典 藝術 木卡姆

木卡姆（Mukam），是伊斯蘭諸國普遍存在的一種音樂文化，目前在中亞、西亞、北非、南亞地區廣泛流傳著這種體系的音樂。但是，各國木卡姆音樂無論在名稱上還是在內容上都有很大差別，沒有一個國家的木卡姆與另一個國家完全相同。，

本文所稱的“木卡姆”（Mukam），是指中國維吾爾族音樂。土耳其則稱“馬卡姆”（Makam），而阿拉伯諸國則廣泛稱作“馬嘎姆”（Magam）。對於“木卡姆”的概念，各國也不一致，阿拉伯國家用來稱指“調式”，而中國維吾爾則指套曲而言。

儘管如此，這些名稱稍有區別的木卡姆都屬於一個音樂體系。它們具有幾個共同點：一、在律學上具有中立音程，屬於“四分之三音”體系。二、在調性方面有固定的安排，但是其音樂結構取決於空間和時間的因素。演出空間的大小和時期的長短，對音樂結構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即興演奏和演唱是一個典型的特徵。三、在樂器使用上有某些共同之處，節奏上也有類似的地方。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即這些國家和地區都

信仰伊斯蘭教。

雖然許多國家採用木卡姆術語，但是各國古典音樂名稱則不盡相同，比如：印度稱自己的古典音樂為“拉格”（Raga），伊朗稱作“達斯特加赫”（Dastgah），北非稱作“努巴（Nuba），埃及稱作“多爾”（Dor）等等。這種現象正是各國音樂植根於本民族文化中而產生。國際學術界中有的學者僅根據木卡姆名稱相似，就斷言伊斯蘭音樂中維吾爾木卡姆是“舶來品”，其論斷未免失之偏頗。

中國維吾爾木卡姆有著悠久的歷史，從宏觀而論，它的確與其他伊斯蘭諸國音樂有某些共同之處，但是從微觀分析比較，則明顯看出，中國維吾爾木卡姆並不是舶來品，而是繼承和發展了西域古代音樂的傳統，有其鮮明的藝術特色。為此，本文就中國維吾爾古典音樂木卡姆的基本類型與特點介紹如次。

中國維吾爾木卡姆有多種形式，各自都不相同，而且差異很大。如果說是外來藝術，它們應是同一種模式，而實際並非如此。中國維吾爾木卡姆有《喀什木卡姆》、《刀朗木卡姆》、《哈密木卡姆》、《伊犁木卡姆》、《吐魯番木卡姆》等多種形式，此外，鄯善、庫車、和田、莎車地區也有不完全的各具特色的木卡姆。現分別扼要論述。

### 一、喀什木卡姆

這種木卡姆主要流傳在中國新疆南部喀什噶爾地區。喀什，古代叫“疏勒”，唐代曾在這裏設置都督府。喀什地區自古以來歌舞藝術就很發達，流傳在這個地區的音樂舞蹈史稱疏勒樂。據中國史籍《隋書·音樂志》記載，疏勒樂有“歌曲亢利死讓樂，舞曲有遠服，解曲有鹽曲”。已經具備“歌曲”、“舞曲”、“解曲”這三部分結構，說明其樂舞藝術是相當完善的。《北魏書》中記載說，北魏太武帝太延二年（西元 436 年），疏勒樂即傳入中原。疏勒藝術家中裴神符以作曲而聞名唐代。裴興奴的芻琵琶演奏曾傾服長安。疏勒樂對中國古代藝術的發展起過積極的歷史作用。

喀什木卡姆就是在疏勒樂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大型套曲。它繼承和發展了疏勒樂中“歌曲”、“舞曲”、“解曲”的音樂形式。喀什木卡姆有

十二套，維吾爾人習慣稱之為“十二木卡姆”。每套由“瓊拉克曼”、“達斯坦”和“麥西熱甫”三部分組成。這十二套木卡姆名稱如下：

- 1· 拉克木卡姆
- 2· 且比亞特木卡姆
- 3· 木夏烏熱克木卡姆
- 4· 恰爾尕木卡姆
- 5· 潘吉尕木卡姆
- 6· 烏紮勒木卡姆
- 7· 艾介姆木卡姆
- 8· 烏夏克木卡姆
- 9· 巴雅特木卡姆
- 10· 納瓦木卡姆
- 11· 西尕木卡姆
- 12· 依拉克木卡姆

每套木卡姆中第一部分稱“瓊拉克曼”，意思為“大麵”，起板為自由節奏，音樂風格典雅、深沉。第二部分“達斯坦”，意為“敘事組曲”，音樂抒情流暢，多為詠歎性。第三部分“麥西熱甫”，是一種載歌載舞的形式。每套木卡姆雖有固定的程式，但是其旋律和歌詞並不一樣。每套木卡姆各有其不同的藝術特色。

喀什木卡姆中的“瓊拉克曼”結構最豐富。它由一首感情深沉的散板序唱開始，緊接“太孜”，經過“怒斯赫”、“小賽勒克”、“朱拉”等段落，一直到興奮熱烈的“賽乃姆”和“大賽勒克”而達到高潮，最後以輕快的“太喀特”結束。其音樂發展的特點是：深沉—展開—熱烈—奔放。具體排列順序如次：

#### 瓊拉克曼結構

散序—太孜—太孜間奏曲—怒斯赫—怒斯赫間奏曲—小賽勒克—小賽勒克間奏曲—朱拉—賽乃姆—大賽勒克—帕西路—帕西路間奏曲—太喀特。

喀什木卡姆的調式非常豐富，有 Do，Re，Mi，Sol，la，Si 等調式，每一種調式又包括有各種音階，有五聲音階，六聲音階，七聲音階以及各

種變化音的音階，四分之三音的運用也是其中的一個突出特色。

喀什木卡姆中還有一些特殊調式，其結構已超過七聲音階，出現了：  
D、G、C、E 等變化音。

還有部分曲調，出現有上下遊移特點，其中有：

C， D， E， F， G

綜觀這些調式，可以發現兩個特點：

一、這些調式大多以 d 為主音，這和大部分維吾爾族彈撥樂器的外弦定音一致。

二、許多調式中，有“ ”、“ ”符號，這表示升高或降低一個  $1/4$  音，但是，其變化並不固定，往往具有遊移性，基本上在 50 音分左右劃揉，從而構成了維吾爾音樂的獨特風格和韻律。由於維吾爾音樂中調式，調性的多變，使喀什木卡姆的旋律更加生動，表現力更加豐富。

喀什木卡姆的主要伴奏樂器是“薩他爾”和“達蔔”，也有“薩他爾”、“達蔔”和“卡龍”的編配。由於喀什木卡姆在新疆各地廣為流傳，因而各地則可因地制宜採用不同的樂器。喀什木卡姆全部演唱完需要二十四小時之久，是維吾爾音樂中最豐富的一種木卡姆。

## 二、刀朗木卡姆

這種木卡姆主要流傳在新疆麥蓋提、巴楚、阿瓦特等地，統稱刀朗地區。這個地區漢代屬尉頭國，三國及北魏時歸屬龜茲管轄，隋代入疏勒國，唐代在這裏設有尉頭州，元明時期歸屬別失巴里。

刀朗木卡姆，與喀什木卡姆完全不同，無論是在名稱上，調式上，還是在旋法上，節奏上，甚至伴奏樂器上都有相當大差異，風格迥然不一致。

歷史上流傳在刀朗地區的木卡姆很多，但是目前搜集到的主要有九套，即：

- 1· 茲裏巴牙宛木卡姆
- 2· 烏茲哈勒木卡姆
- 3· 拉克木卡姆
- 4· 木夏烏熱克木卡姆

- 5·崩比亞宛木卡姆
- 6·朱拉木卡姆
- 7·森比亞宛木卡姆
- 8·胡代克木卡姆
- 9·都尕買提木卡姆

在阿瓦特流傳的刀朗木卡姆，與麥蓋提的九套名稱上不盡相同，尚有一些區別。刀朗木卡姆的結構由五部分組成，即：

- 1·散板序唱
- 2·切克特曼
- 3·賽乃姆
- 4·賽勒克斯
- 5·賽乃曼

但是，阿瓦特地方流傳的刀朗木卡姆前四套結構如上，可自第五套木卡姆後，則只是“麥西熱甫”似的形式。從風格上講，麥蓋提地方的木卡姆一開始是高亢、奔放、激昂的散板，然後才由高音區下降，進入切克特曼部分，給人一種粗獷豪邁的感覺。阿瓦特地方的木卡姆在演奏上要比麥蓋提地方木卡姆細膩些，旋律進行較平穩。這說明，同是一個地區的刀朗木卡姆，在不同的地方，也存在有一些不同特點。儘管它們在風格上基本相似，我們統稱為刀朗木卡姆，而從音樂上辨析，仍有一些差異。

清代乾隆年間編撰的《律呂正義後編》中，記載的是刀朗木卡姆，該文獻中所說的“回部樂”，就是指刀朗木卡姆。因為史載的“塞勒喀思”、“塞那滿”、“珠魯”，與現今刀朗木卡姆中的“塞勒喀思”、“塞乃曼”、“朱拉”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在清代編著的《皇朝禮器圖式》中，描繪有樂器圖，其中的“喇巴卜”、“哈龍”和“哈爾紮克”，與現今刀朗木卡姆中使用的“熱瓦甫”、“卡龍”和“艾介克”完全相同。

刀朗木卡姆的音樂形態與喀什木卡姆不同，具體介紹如次：

### 一、散板序唱：

一般先演奏一段器樂作為引子，然後由一位歌手演唱自由節奏的木卡

姆。其特點是開闊、高亢。旋律多出現裝飾音、滑音。結束時是一個延長音，此時手鼓開始伴奏，其唱聲開始，樂曲進入正規節奏。

## 二、切克特曼

速度比較徐緩，節奏為 6/4 拍。達蔔的基本點為：D DOD T O OT。演唱的旋律，在句法上常以兩拍為單位。

## 三、賽乃姆

速度中庸，平穩。節奏為 4/4 拍，節奏型為：DT TT TO I D OT OD T。這是最基本的鼓點，演奏者常常加花點豐富，以便適應旋律的變化。這段音樂是刀朗木卡姆中的主要部分。

## 四、賽乃克斯

速度較中速略快，節奏為 2/4 拍。基本節奏型為：D OTODT。這段音樂的節奏與“賽乃姆”相似，但演奏效果緊促而活躍，動感性較強，起著一種“起承轉合”中的“轉”的位置，從而有效地把音樂推向高潮。

## 五、賽乃曼

速度加快，節奏仍為 2/4 拍。其基本節奏型為：D·T DO。重音落在正拍上，熱烈而有力。這一段是刀朗木卡姆的尾聲部分，氣氛歡騰而奔放，具有強烈的感染力。當音樂達到高潮時，嘎然而止，結束了整套木卡姆演唱。

刀朗木卡姆的調式中，小調的色彩較強，因而以 Re、La 調式居多。其中 Mj 調式較少見，現存刀朗木卡姆裏，僅有“都尕買提木卡姆”是 Mi 調式。大調色彩的 Sol 調式也不多，而純粹的 Do 調式，則沒有見到。

Re 調式廣泛的存在於刀朗木卡姆中。它好比是 la 調式和 Sol 調式之間的橋樑。因為它既便於進行到 la 調式，又便於進行到 sol 調式。比如“烏茲哈勒木卡姆”中，是由 Re 調式轉到 sol 調式；在“拉克木卡姆”中，則是由 sol 調式轉到 Re 調式；在“木夏烏熱克木卡姆”中，則是由 Sol 調式轉到 Re 調式後，再轉到 la 調式。

在 Re 調式中，常有兩種終止式，一種是在主音 Re 上終止；另一種

不在主音 Re 上終止，而在第七級音 Do 上終止，但並不構成 Do 調式。

la 調式在刀朗木卡姆中也佔有重要地位，除了用於段落的中間，大多數刀朗木卡姆，都在 la 調式上作最後的終止。另外，在 la 調式中，也有不在主音 la 上終止，而在第七級音 sol

上終止，並沒有構成 Sol 調式。

刀朗木卡姆中，“都尕買提木卡姆”則是 Mi 調式，而且三級音升高，不同于自然音列中的 Mi 調式。

由於刀朗木卡姆是一種歌舞組曲，結構比較龐大，每套木卡姆的演奏時間，從七、八分鐘到十幾分鐘不等。爲了豐富旋律色彩，從而使用多種調式，並且發生某些變化。但這種變化，都是比較接近的關係。在變化手法中，有在同一音階上變換不同調式，也有在同一音上作不同調式的變換，或者明顯採用轉調。

刀朗木卡姆的旋律由七聲音階構成，但其旋律骨架具有明顯的五聲音階性質。然而這種五聲音階決不等同於漢民族音樂中的五聲音階，因爲其音樂中大量使用了裝飾音，Fa、Si 兩音往往發生“潤變”，即做  $1/4$  音的上下移動。加之固有的節奏特點，使刀朗木卡姆形成了在五聲音階基礎上發展演變起來的獨特音樂風格。

刀朗木卡姆在旋律發展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即：Do、Fa、Sol、Si 等音，往往升高或降低  $1/4$  音或半音。它們有時出現在弱拍上，有時出現在強拍或次強拍上，從而使刀朗木卡姆具有特殊的旋律風格。在樂句中，幾乎見不到五度以上的跳進。平穩的級進和三度、四度的跳進，是刀朗音樂中的主要特點。刀朗木卡姆的音域不太寬，常在十一度之內。

刀朗木卡姆除音階，調式上有特點外，常常使用許多拖腔，氣息悠長，並且用“呵唉”、“哦呵”、“喂”等襯詞。拖腔一般處於各部分之間的轉換及全瞞的結束處。它與唱詞部分形成對比，使音樂更加粗獷豪放。

刀朗木卡姆的伴奏樂器與其他木卡姆不一樣。它使用“刀朗熱瓦甫”、“刀朗艾介克”，獨具特色，同時，也使用“卡龍”和“達卜”伴奏。

### 三、哈密木卡姆

這種木卡姆流傳在新疆東部哈密地區。哈密，漢代稱“伊吾廬”，爲匈奴衍王庭，漢代在這裏設置了“宜禾”都尉。三國時期屬於鮮卑西部，北魏時屬於蠕蠕管轄。隋代築新城號新伊吾，後隸屬西突厥。唐貞觀四年置西伊州，改稱“伊州”。明代永樂四年建“哈密衛”。

流傳在哈密一帶的古代音樂是一種大麴形式，唐代稱“伊州”。唐玄宗時尤爲盛行，致使“教坊人唯得舞伊州”。唐宋時期尚有《北庭伊州》曲，則是根據北庭都護府而命名的。此外尚有《伊州遍》、《伊州袞》等曲名。伊州大麴對中國古代音樂有過一定影響，歷史上著名的《陽關三疊》就是採用伊州樂曲。哈密木卡姆就是在伊州大麴的基礎上發展產生的。

哈密木卡姆與喀什木卡姆、多朗木卡姆完全不同，共有十九套：

- 1．瓊多爾木卡姆（上），由十七首歌曲組成。
- 2．瓊多爾木卡姆（下），由十三首歌曲組成。
- 3．烏魯克多爾木卡姆，由十首歌曲組成。
- 4．木斯塔紮提木卡姆（上），由十三首歌曲組成。
- 5．木斯塔紮提木卡姆（下），由十六首歌曲組成。
- 6．恰勒尕木卡姆（上），由九首歌曲組成。
- 7．恰勒尕木卡姆（下），由十三首歌曲
- 8．胡樸提木卡姆（上），由二十首歌曲組成。
- 9．胡樸提木卡姆（下），由十三首歌曲組成。
- 10．且比亞特木卡姆（上），由十首歌曲組成。
- 11．且比亞特木卡姆（下），由十四首歌曲組成。
- 12．木夏烏熱克木卡姆（上），由十三首歌曲組成。
- 13．木夏烏熱克木卡姆（下），由十二首歌曲組成。
- 14．烏紮勒木卡姆（上），由十五首歌曲組成。
- 15．烏紮勒木卡姆（下），由十二首歌曲組成。
- 16．刀阿木卡姆，由十首歌曲組成。
- 17．刀朗木夏烏熱克木卡姆，由十一首歌曲組成。
- 18．依拉克木卡姆，由十三首歌曲組成。



19·拉克木卡姆，由十一首歌曲組成。

如果將上、下兩段木卡姆並為一整套，也是十二套木卡姆。哈密木卡姆中，每套由兩部分組成，開始是一首較長的散板序唱，接著是由九至十七首歌曲組成，中間沒有間奏曲。

哈密木卡姆基本上是一種民歌套曲。它與一般聯唱的不同之處，在於前面多一首散板序唱。演唱形式很自由，樂曲可多可少，表演人數也不一定。演唱可隨意填詞、作詞，曲目也

可自由選定。

哈密木卡姆的旋律有四聲、五聲、六聲和七聲多種。調式中有 Do、Re、Mi、Sol、la、Si 等六種。其中，Do、Re、Sol 調式使用最多，la 調式其次，而 Si、Mi 調式出現較少。從調式音列上看，哈密木卡姆有四聲調式音列、五聲調式音列、六聲調式音列、七聲調式音列等，每種調式音列中又有三到十七種不同排列。

哈密木卡姆的伴奏樂器使用獨特的“哈密艾介克”以及“刀朗熱瓦甫，和‘達蔔’”。其中的“哈密艾介克”，不同於維吾爾其他木卡姆中的同類樂器，而是近似於漢民族的“四胡”形狀。

#### 四、伊犁木卡姆

這種木卡姆，流傳在新疆西北部伊犁地區。伊犁，漢代稱“伊烈”，漢晉時烏孫人，鐵勒人曾在此遊牧。魏時這裏是悅般和高車的勢力範圍。北周至隋，這裏臣屬於西突厥。唐代回鶻、葛邏祿等突厥民族在這裏居住。元代叫“阿力麻裏”，為蒙古王海都之管轄。明末清初歸屬準噶爾部。西元 1757 年，清朝平定準噶爾部後，考稽古典，取“伊麗河”而命名，自此有“伊犁”這個地名。”

伊犁木卡姆產生比較晚。西元十七世紀，準噶爾部執政時，將南疆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烏什等地維吾爾人遷往伊犁屯墾。他們被稱作“塔蘭其”人。此外還有州作“伯德爾格”的一些南疆商販也遷居到伊犁。這些人把喀什木卡姆傳到了伊犁，從而逐漸形成了伊犁木卡姆。

伊犁木卡姆由十二套組成：

1·拉克木卡姆

- 2· 且比亞特木卡姆
- 3· 木夏烏熱克木卡姆
- 4· 恰爾尕木卡姆
- 5· 潘吉尕木卡姆
- 6· 烏紮勒木卡姆
- 7· 艾介姆木卡姆
- 8· 烏夏克木卡姆
- 9· 巴雅特木卡姆
- 10· 納瓦木卡姆
- 11· 于孜哈爾木卡姆
- 12· 於賽因木卡姆

伊犁木卡姆不同於喀什木卡姆之處，在於它沒有“瓊拉克曼”部分，只有“散序”、“達斯坦”和“麥西熱甫”。其中“達斯坦”往往是二至六首歌曲和二至六首樂曲組成。“麥西熱甫”也沒有喀什木卡姆豐富。

伊犁木卡姆的基本結構中，除開始的散序外，在曲與曲之間，還有過門與間奏，以《拉克木卡姆》為例：

引子一（進入達斯坦）歌唱—過門—歌唱—間奏曲—引子—歌唱—間奏曲—引子—歌唱—間奏曲—（進入麥西熱甫）—歌舞—歌舞—歌舞。

伊犁木卡姆的調式與喀什木卡姆基本相同，但是，仍有其佈局之特點。常採用兩個或多個不同調式作對比，就是同一種調式中，往往變化音列之組合。在調式的轉換時，常常運用

主音位置不變而變換其調式的手法，因而自然不生硬，使旋律充滿韻味。

此外，新疆木卡姆研究所 1986 年在吐魯番地區的托克遜縣普查時，錄製了《吐魯番木卡姆》，只收集到十套：

- 1· 拉克木卡姆
- 2· 達爾達特木卡姆
- 3· 木夏烏熱克木卡姆
- 4· 恰爾尕木卡姆
- 5· 潘吉尕木卡姆

- 6·烏紮勒木卡姆
- 7·艾介姆木卡姆
- 8·烏夏克木卡姆
- 9·納瓦木卡姆
- 10·巴雅特木卡姆

綜上所知，維吾爾木卡姆有多種形式，而且各不相同。無論哪一種木卡姆都與伊斯蘭諸國的音樂均不一樣。儘管都採用了“木卡姆”術語，但實質上則有很大差異。比如斯蘭音樂中廣泛採用“耐依”（Nay）術語，可中國維吾爾的耐依是“橫笛”，而阿拉伯的耐依是“豎笛”。又比如，拉巴蔔”（Rahab）術語，阿拉伯指一種弓絃樂器，而中國維吾爾音樂則是指彈撥樂器，諸如此類現象有很多。

當然，作為伊斯蘭音樂中的共同之處是，許多國家都採用了“達蔔”類打擊樂器，廣泛使用著四分之三樂制，維吾爾木卡姆也不例外。這種現象的產生，正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文化交流融匯的結果。但這僅是“流”，而不是“源”，各國古典音樂都是繼承和發展了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因此我們說，絲綢之路諸國音樂中既有“共性”，更具有鮮明的“個性”。各國人民都為發展絲綢之路音樂做出了歷史的貢獻。

（本文於 2009 年 6 月 15 日投稿，於 2009 年 9 月 18 日審查通過）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純金扔在水裡沖不走，扔在火中燒不壞。（傣族）

寧願冰死也不願烤燈上火。（黎族）

窮苦不吃衙門飯，困難莫拜觀世音。（壯族）

寧喝朋友稀飯，不吃強盜酒肉。（壯族）

壯士凍死不賣劍，秀才餓死不賣書。（回族）

不要貪圖山珍海味，不要酷愛榮華富貴。（赫哲族）

即使少錢財，也不近強盜。（滿族）

寧可按照自己意志受苦，絕不依仗別人權勢享福。（蒙古族）

在昏君手下當官，不如在窮人門前討飯。（蒙古族）

與其吃巴依的抓飯，不如喝自己的稀飯。（柯爾克孜族）

坐在他人寶座上，不如蹲在自家涼棚下舒服。（烏孜別克族）

朋友面前別昂首，敵人面前別低頭。（哈薩克族）

雄獅不會爬著走，英雄不願跪著生。（維吾爾族）

箭矢不能亂射，靈魂不能出賣。（維吾爾族）

白馬不褪色，黃金不變質。（藏族）

活著要有一顆純潔的心，死了要留一副清白的骨。（藏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現代國家疆域的歷史與民族分裂的關係<sup>1</sup>

吳楚克博士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美國俄勒岡大學高級訪問學者

## 摘 要

本文針對當前一些國家出現的制度轉換或民族分裂的形勢，提出從世界近現代史角度考察現代國家產生的特點，我們就能夠解釋當今世界國家疆域和民族分裂的事實。對這個基本的理論問題，學界不應該因為涉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而視而不見，在全球出現金融危機後，美國一些有遠見的學者已經開始反思馬克思和共產主義國家的轉向。

## 一、國家的本質與現實“民族—國家”的訴求

在構建跨界民族和中國地緣安全的理論體系中，我們不得不涉及到一些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如果不對這些理論問題進行理論框正，我們就無法邏輯地理解一些國家邊界爭端和民族分裂問題。如，在一些民族理論的研究中，把“民族走向國家”看作是民族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或者理論上認為“民族必然走向國家”是民族發展的一個規律。顯然，這種觀點是基於近代資產階級民族建立政治國家後，在世界範圍出現的民族解放與獨立運動的歷史，這個歷史已經隨著民主國家本質的確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各國世界格局的認識而終結，儘管還有局部的變化，但這些變化並沒有改革世界格局的發展趨勢，就是維護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保證各國的生存權、發展權。因此，任何導致國家分裂和民族分離的活動都會遭到世界各國的譴責和阻止，遭到動蕩國家政府的鎮壓。如果我們依然肯定這

---

<sup>1</sup> 本文是大陸教育部重大攻關課題“跨界民族與中國地緣安全”的中期成果

種違背現時代民主國家發展的基本要求，就是對自己國家政治制度的懷疑。這個錯誤理論觀點不僅是對近代國家產生和國家本質的誤解，更是對少數民族發展方向上的理論誤導。

從理論根源上講，儘管當代資產階級理論家們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批評和責難，甚至一再宣佈馬克思的理論早已經過時，但沒有一個西方社會理論家在他們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時邁過馬克思，更沒有一個人在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上超越馬克思。在分析國家的本質問題上，當代西方最有成績的理論家們都基本上接受馬克思的觀點，認為近代國家是人類從古代發展到近代最具有意義的社會形態，是人類從自為狀態進入自在狀態的唯一“入口”<sup>2</sup>。也就是說，從古代人類社會發展到“市民社會”階段，才出現了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的分離，由此導致近代“政治國家”的出現，用馬克思的話說，國家“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那種以為，民族自身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特別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會走向國家或者提出建立國家的訴求，完全忽視了近代國家的產生是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選擇，而不是主體的主觀訴求這一事實。

首先，古代國家與近代國家的根本區別是近代以前的所有國家都表現為國家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同一性，就是說國家政治生活表現為每一個人的政治生活。因為，在那個時代，組成國家的人們的所有活動就是國家政治，人們把自己自然而然地當作擁有“國家身份”。而近代國家的產生是在這種國家與“市民社會”同一的狀態<sup>3</sup>發展到原有的國家機器再也無法調節資源分配和勞動分工的情況下，國家政治和市民社會出現分離，國家

---

<sup>2</sup> 馬克思在他著名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德意志意識形態》、《1844年哲學經濟手稿》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系統地闡述了他對國家本質的理解，從根本上顛倒了黑格爾對國家理解的主觀性，他的理論至今還是西方關於國家理論的研究的“至高點”，包括當代西方最著名的經濟史學家，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道格拉斯·諾斯，在他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派”理論中，自始自終貫穿著馬克思關於國家的理論核心思想。而在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理論的中國，馬克思的基本觀點不是被盲目地認為陳舊，就是根本沒有理解。

<sup>3</sup> 馬克思認為：近代政治國家的產生源于市民生活，而又高於市民社會。因此，近代國家最大的特點，就是國家政治生活與市民社會的分離，每個人當從事國家政治生活時，他才處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個人生活完全屬於“個人自由”的範圍。而在這之前，每個人的活動就是政治活動。

政治上升為國家制度並凌駕於“每個市民”之上，這時近代政治國家產生了，也就是統治階級把國家變成每個人都必須接受其統治的“暴力機器”。所以，國家的本質是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和對統一市場的追求，實質是用國家的“法的力量”把階級利益分配下去，自然，統治階級的利益就是佔有統治地位的利益，統治階級的思想才能占到統治地位。如果我們忽視了這種古代與近代國家的本質區別，就使一些人以為：歷史上的民族，大多數是通過國家來有效保護自己並得到發展，而沒有建立自己國家的民族最終將被“同化”或者融合在主體民族中，所以，每個民族走向國家是民族發展的必然。這恰恰是本末倒置。是國家產生以後才通過國家暴力的方式擴張和維護民族國家利益的，當然，屬於統治階級的那個民族無疑會發生壯大與削弱、繁榮與衰落這樣的過程，但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從來都不是以民族利益為核心的。

其次，世界上之所以多民族國家占絕大多數，起因是近代國家產生時的物質生產要求社會勞動分工的發展必須由一種有效的規則來分配，通俗的講，就是生產力發展要求生產關係發生革命性變革。也就是說，近代國家產生之初，並不是出於民族獨立和發展的訴求，而是物質生產發展的需求，無論你屬於哪個民族，都會主動或者被動地進入自由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sup>4</sup>，也可能他們以前生活在一個共同的“王國”或者屬於某一“國王”，現在生活在由國家政治制度維護下的契約組織和統一市場中。當然，這是一個歷史過程，但民族成為國家的主體，顯然是在那些早期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利用“先進的”國家暴力侵略和征服其他民族以後，民族的身份被格外的突出，民族的認同與其佔據統治地位的國家的認同逐漸出現統一的情況後才成為可能，所以，史達林把這個時期的一些民族稱為“資產階級民族”是有一定歷史依據的。

其三，在近代國家產生以前，我們今天“定義的民族”是不存在的，民族本身就是一個歷史的動態的發展形態。近代政治國家產生以後，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才成熟和突出出來，特別是像中國這樣具有悠久歷史的多民

---

<sup>4</sup>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充分論述了資本主義國家誕生以來，如何以廉價的商品為“重炮”，打開一切封閉的“萬里長城”，對資本主義制度在促進勞動生產率方面的作用給予充分肯定。

族國家，少數民族與漢族在“矛盾共生”狀態中不斷發展，直至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大國，中國封建社會沒有出現西方國家的宗教排斥，也沒有出現早期種族清洗和“種族立國”原則<sup>5</sup>，而是在中央集權控制下，“建立了特殊的民族治理政策”，如政教合一制、土司制、盟旗制等，因此，今天擁有國家的主體民族和沒有擁有自己國家的少數民族，是在目前國家形態基本形成以後出現的現象，而在此之前，每個民族經歷的產生與發展、壯大與衰弱、繁榮與落後，都是歷史發展的自然進程，不是哪個民族的主觀意志，也不是哪個民族的客觀條件所能決定，而是國家歷史發展的自然進程和少數民族發展的歷史要求的合理統一。

其四，“十月革命”後爆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和獨立運動，是舊的國家形態在新的世界社會主義思潮中的破碎，但新誕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大部分是蘇聯輸出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產物。我們一般強調俄國十月革命前爆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和獨立運動屬於舊民族主義革命思潮，因為，這些革命的目標一般是要恢復舊國家政權。而十月革命以後，這些革命屬於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革命的目的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國家。列寧的這一觀點是基於當時喚起資本主義殖民體系發生普遍革命，以帶動和支援俄國革命。當然，東方社會主義運動的成功可能的確出乎列寧的預料，但大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和獨立運動的最高意義是擺脫了宗主國的統治，重新回到舊的制度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蘇聯的直接支援或者間接扶持下，世界的東方出現了一批社會主義國家，並在隨後的幾十年裏，社會主義陣營成為世界上強大的政治力量，而共產主義思想也曾經為地球一半以上的人口所奉行。然而，值得我們深思的是，那些已經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並且獲得快速發展的蘇聯和東歐，在解體

---

<sup>5</sup> 在羅馬帝國解體以後，以西歐為主的西羅馬帝國的繼承者們開始對東羅馬帝國及其種族進行攻擊，東羅馬帝國逐漸向東歐、俄羅斯傳播其宗教，形成以斯拉夫人為主的東正教集團，並從 13 世紀開始了泛斯拉夫狂潮和以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為代表的西歐國家之間的角力。這是西方“種族－血緣”立國原則的起始，並由此打開了歐洲人的宗教戰爭和民族征服戰爭。所以，在西方文明裏，種族意識和宗教意識是最根深蒂固，也是社會關係中最敏感的問題，表面上，他們似乎不存在像中國的民族問題，實質上，西方國家存在的種族歧視問題和少數族裔語言文化消失的問題，比我們更為嚴重，因為，主流社會根本就沒有把真正扶持少數族裔發展提高到國家政策的高度，他們主張的“融爐”政策才是國家的核心策略。如美國對印第安土著實施的純種印第安人的後代享受補貼的政策，本質就是滅絕性的政策。



後，不是舊制度迅速復活，就是迅速回到資本主義制度中。這只能有一種說明，就是當初建立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完全脫離本國歷史發展的正常軌跡造成的一種畸形社會形態。只是從道德意義上看，幾代人的智慧和力量付諸東流！

其五，蘇聯東歐解體後出現的新一輪民族國家獨立狂潮，本質正是政治對立的復仇，是舊的民族國家形態通過政治制度的選擇，重新回到現實社會中。因此，蘇聯東歐解體後新獨立的民族國家並不代表“民族走向獨立”的發展趨勢，相反，在某種程度上，是民族屈從於意識形態的傾向，是資產階級野蠻的“血緣—種族”立國思想的迴光返照<sup>6</sup>，是歐洲傳統的泛斯拉夫主義和盎格魯—撒克遜爭奪政治版圖鬥爭的暫時結果。我們要透過東西方意識形態的對壘，看到這種表面鬥爭掩蓋下的政治國家間的較量，因為，在當今世界上，奉行哪種政治制度，標誌著這個國家政權是由哪個階級來執掌，不是標誌著哪個民族來執掌<sup>7</sup>！即便是某個民族中的少數人得到西方國家的支援，也可能會主導這個國家的政治走向。獨立前的亞美尼亞局勢和後來格魯吉亞發生的“顏色革命”<sup>8</sup>，就是最鮮明的例

<sup>6</sup> 在前南斯拉夫發生的“波黑戰爭”中，號稱日爾曼兄弟的克羅地亞得到當時德國的全力支持，在獨立投票前，當時的德國總理科爾，甚至親自跑到克羅地亞，為投獨立票的人加油打氣。德國也是第一個承認克羅地亞獨立的歐盟國家。這被世界輿論認為是德國日爾曼民族以“血緣—種族”為理由支持克羅地亞獨立，如果沒有德國在波黑戰爭中對克羅地亞的全力支持，波黑戰爭的結局是難以預料的。

<sup>7</sup> 發人深思的是，2009年4月20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參加美洲國家首腦會議，奧巴馬總統奉行與前總統布希不同的政策，與美洲國家採取平等的諒解姿態，並與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握手言和，被美聯社專欄評論為“美國的戈巴契夫”！真是太有啟發了，西方政治家們讚美戈巴契夫並授予他諾貝爾和平獎的險惡用心，由此暴露無疑。

<sup>8</sup> 在蘇聯解體前的1990年11月，蘇共中央曾就是否保留蘇聯國家舉行過全民公決，據當時官方的統計結果看，中亞五個加盟共和國支持保留“聯盟”的占到90%以上，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支持率最低，但也達到70%以上，而當時的波羅地海三國，因為已經宣佈自行獨立，所以，這三個國家民主派把持的政府極力阻止公民投票，但人民依然衝破各種阻礙，自發地組織了投票，當時的亞美尼亞媒體在西方國家的支持下，封鎖全民公決的消息，但依然有6萬人衝破政府有組織的破壞投了贊成票。

格魯吉亞在2006年爆發的“顏色革命”，根本就是西方反俄勢力企圖徹底擊垮俄羅斯的陰謀，其中帶有深刻的“冷戰”意識。事實上，徹底“民主化”了的格魯吉亞，不但沒有給自己帶來“和平和自由”，相反，試圖運用戰爭來解決俄格之間存在的爭端，直接導致格魯吉亞民族利益嚴重受損，而此時，那些公然支持格魯吉亞動武的西方民主國家，並沒有因“共同價值觀”而伸出援助之手。甚至當格魯吉亞

子。在蘇聯東歐解體過程中，那些冠以“全民族”的，或者冠以“民族英雄”的，甚至冠以“全人類”的，往往恰恰代表了少數人的利益。

綜上所述，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民族間融合的趨勢應該是歷史發展的正確和正常的方向，一個國家內部民族間的融合更應該符合民族自身利益和國家利益，而且，由於經濟全球化和傳媒世界化的推動，民族隔閡的消融和文化差異的交融速度更加迅速。那些導致國家分裂和民族正常發展的因素，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都是一種破壞性因素，起碼屬於暫時倒退性質，我們可以肯定，在未來歷史發展的某個時期，他們還將“九九歸一”，那時，人們將會對造成歷史倒退的因素進行<sup>9</sup>批判和反思。

也正因為如此，在當今世界，依然認為“民族—國家”是民族發展的客觀規律或歷史要求，就是無視近代政治國家產生的時代要求，漠視世界上絕大多數多民族國家統一、融合和發展的正常要求，違背民族自身發展的實際要求。世界上已經發生的那些挑撥和支援別國國內民族分裂分子，嘗試通過“民主革命”、“顏色革命”、“宗教革命”來達到民族“獨立”或者右翼政府上臺的背後勢力，沒有一個屬於該民族，這些異國異族人的興趣，不在於你們真的是否能夠獨立和民主，而在於是否導致國家動亂和民族災難，這樣，他們就失去了一個真正的國家對手，扶持了一個在政治理念上認同西方“民主自由”的執政黨，這樣，他們就擁有一種“民主制度”優越感，或許還能成為“鄰國災難”的拯救者。現實的教訓一再提醒我們，堅持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正確發展道路，是每一個民族的歷史選擇，也是每一個民族發展的必然選擇。

## 二、兩次世界大戰破壞了“民主—國家”的疆域

近代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產生後，那些在中世紀封建制度下遠不如大陸國家發達的海洋國家，如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英國、義大利等，利用強大的海軍把海洋貿易推向世界，瘋狂侵佔其他生產力落後的國家，殘酷掠奪別國資源，為歐洲資本主義繁榮輸送了沾滿鮮血的早期資本。到第一

---

提出加入歐盟和北約時，因為擔心由此捲入格俄衝突而拒絕了格魯吉亞。出賣格魯吉亞的就是那些所謂格魯吉亞的“民族精英”。

次世界大戰前，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在 1870 年代開始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刺激下，達到歷史新高。電氣化時代的最突出特點是產品標準化和現代交通工具——汽車開始出現，只有在產品標準的帶動下，真正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才能實現，而且，產品標準的制定和使用規範，實事上就給使用這些產品的國家和地區規定了生產和生活的特別規則，也就給資本主義國家制定所謂國際“慣例”提供了條件。當然，大規模商品生產的直接後果是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和新興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更加激化。

與封建時代的侵略和討伐不同，資本主義制度要求不斷擴張的市場和資本，並將其全部置於自己的壟斷下。這就必然促使資本主義國家把侵略別國和推銷本國作為一個任務的兩個目的，把被侵佔國變成資本主義商品和資本的市場，同時，又要保持其落後的狀態以只能夠購買和消費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的廉價商品，輸出不可再生的原料和低價勞動力。。其實，這種狀況在今天依然如此，只不過是以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的運作方式進行。追求利潤最大化必然導致壟斷，壟斷又必然導致獨佔，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從自由競爭到壟斷的“必由之路”。那麼，壟斷的市場越大，資源也就越多，利潤也就越大。所以，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新興資本主義國家要求打破舊的國家格局，重新拆分商品和資本市場的局面，已經到了無法調和的地步。

當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公然的“弱肉強食”結果，促使歐洲版圖出現了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變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歐洲出現了 1848 年的德國革命和 1871 年的法國“巴黎公社”革命，這些革命反映出主要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階級矛盾已經達到相當激烈的程度，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領導的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團結各國工人階級為無產階級共同利益而奮鬥，避免工人階級的革命要求被本國資產階級政府利用，達到轉嫁國內矛盾的陰險目的。因此，在他們當時撰寫的著作中，自始至終與各種“民粹主義”、“國家主義”進行鬥爭，特別是對德國工人黨內部一直存在的“國家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今天，我們從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不僅認識到當時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現實特點，更重要的是認識到當時歐洲各國普遍存在的“民粹主義”和“國家主義”思潮，所以，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第三國際徹底蛻變為“本國政府”的代言

人，尤其是馬爾福爾爲代表的德國工人黨，徹底投入到“帝國主義戰爭的愛國主義叫囂中”。也就是說，第一次世界大戰，資產階級政府充分利用“民粹主義”，促使民衆的愛國熱情與民族感情相互作用，在戰爭中爲國家賣命。由此我們也就知道爲什麼馬克思及其倡導的共產主義理論，爲當時歐洲各國反動政府所痛恨。

事實上，我們今天理解的“民族—國家”意識被明確提出來，是近代政治國家產生後，在不斷的國家和民族間發生的戰爭中所運用而生的，而諸如“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理論思想也就在不斷的實踐中提升出來，逐漸形成完整的國家理論和民族思想意識。俄羅斯把“俄羅斯民族精神”的產生歸因於拿破侖的入侵戰爭，所以，每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領導俄羅斯人民戰勝拿破侖的庫圖佐夫就成爲喚起人民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精神的最好榜樣。同樣的事實也發生在處於近代資本主義列強爭霸和侵略其他弱小國家的過程中，以喚醒民族自豪和自強爲主的民族主義來加強愛國主義，以共同應對國家危機。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民族—國家”意識逐步確立並發展爲今天的“民主—國家”意識，但是，構成國家主體的依然是“民族”。因此，我們認爲，兩次世界大戰確立了“民族—國家”意識，並在戰後發展爲以“民主—國家”爲核心的國家模式。

首先，戰爭導致的國家危機，必然直接導致民族危機，民族危機又必然導致以民族獨立和解放爲主導的民族戰爭，戰爭的結果不是民族自決，就是民族失去自決的權利。因此，無論是侵略還是被侵略，只要戰爭的結局中失敗的一方，都會引起強烈的保衛民族生存的情結，這就是民族主義非理性的一面。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是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利用了國內這種民族主義情結，挑起戰爭，結果當戰爭處於失敗境地時，那些被綁架參加戰爭的弱小民族，就會主張自己的權利。奧匈帝國的解體就是最典型的例證。匈牙利脫離戰前衰弱不堪卻又盲目自大的奧匈帝國獨立，儘管匈牙利在奧匈帝國中力量弱小，但匈牙利在 13 世紀組織十字軍東征和 15 世紀反擊奧斯曼土耳其人的進攻中扮演過重要角色，所以，以馬紮爾人爲主的匈牙利人，融合了日爾曼人的血統，具有強烈的民族獨立意識和宗教文化傳統。南斯拉夫王國的出現，在塞爾維亞國王的領導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統一了處於歐洲民族與宗教最爲複雜地域的各民族，包括接近日爾

曼人的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屬於南斯拉夫人塞爾維亞和馬其頓人，以及接受伊斯蘭文化的波黑人。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走向穩定的進步，但如果站在與斯拉夫人爭奪歐洲主導權勢立場上，那麼南斯拉夫的出現就是倒退。所以，直到 20 世紀 90 年代歐洲才有機會迫使南斯拉夫解體，因那場戰爭而導致的力量失衡，才又向西歐方面傾斜。

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弱肉強食”規則，是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原因，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方社會主義國家產生的間接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土崩瓦解的國家都是當時歐洲軍事強大但制度落後的國家，如俄國、德意志、奧匈帝國和土耳其，這些國家之所以出現巨大變革的趨勢，內在矛盾起著決定性作用，戰爭只是外在促進因素，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但沒有實現力量均勢，而是以勝負來劃分勢力範圍，這就促使原本希望通過戰爭來轉移國內變革力量的國家，不但沒有贏得國內政治勢力的支援，反面引起民衆覺醒並聯合起來推翻政府。德國雖然沒有遭遇分裂，但因為失去擴張利益而導致的民族報復情緒給戰後法西斯政府上臺提供了基礎。而沙皇政府的垮臺和俄國十月革命成功，根本改變了 20 世紀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使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戰爭成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導火索，不斷引起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爆發民族解放和獨立戰爭，這些國家中的俄國和德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誰勝誰負的決定因素。我們設想：假如俄國沒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並建立蘇聯社會主義國家，那麼，德國在歐洲的霸權地位將會實現，人類的未來又將會走向何方？儘管這種假設是不成立的，但西方那些民主國家在肆無忌憚地詆毀蘇聯和國際無產階級運動時，是否想到如果沒有蘇聯，現今你的國家是否還存在？

所以，冷戰時期的東西方對立，有意識形態的表面化分歧，把種族和歷史隔閡掩蓋起來。蘇聯解體後，泛斯拉夫與歐洲的對抗在局部地區可能更激烈和長久，因為，無論如何俄羅斯在未來世界格局中都將是不可忽視的力量，單純歐洲任何一個國家無法和俄羅斯對抗，東歐那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急於把自己和北約捆綁在一起，就是擔心重蹈歷史的覆轍。然而，其中那些依然存在著深淺不同的斯拉夫色彩的民族國家，真正被西歐所接受和真正去掉自己的民族色彩，還需要時日。亨廷頓在他的《文明的衝突》

一書中，已經預料了未來世界衝突的根源，雖然有些偏頗，但抓住了問題的要害。

其三，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某種程度上“肢解”了原有“民族國家”的領土疆域，是 20 世紀 90 年代打破“雅爾達體系”的直接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迫使歐洲反共產主義國家與蘇聯合作，顯然，解決國家危亡的問題暫時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對立，但在戰爭的前景開始明瞭以後，合作的必然因素逐漸讓位給勢力範圍的爭奪。所以，儘管戰爭使衆多國家從法西斯統治下解放出來，也使衆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人民擺脫了宗主國的奴役，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對立依然導致了一些國家的分裂。前東、西德國，前南越和北越，今南朝鮮和北朝鮮。此外，一些國家的部分地區也因戰爭導致分離或者分隔，如外蒙古獨立（以 1945 年國民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為時限），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割並獨立，中東巴勒斯坦被分割並以以色列建國，新加坡從馬來西亞分割並獨立。也有一些失去獨立的國家，如波羅地海三國並入蘇聯。從總體上看，從戰後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垮臺中獲利獨立的民族國家劇增，徹底打破了原有的民族國家體系，確立了新的以“雅爾達體系”為核心的民族國家版圖。

其四，兩次世界大戰後，國家主義原則逐步高於民族主義訴求，是對“民族國家”意識肯定意義上的“否定”，是跨界民族矛盾出現的歷史必然。戰爭雖然是殘酷的，但戰爭可以把新的思想迅速傳播過去，就如拿破崙的歐洲戰爭一樣，把新興資產階級的啓蒙思想和國家意識傳播到歐洲各國。同樣，對於亞洲和非洲的落後國家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繼續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其中的一些國家獲得了解放和獨立。原因：一是隨著戰敗國的投降，那些原來還屬於殖民統治下的封建制度國家迅速走上了現代民主國家的建設道路；二是在戰勝國的支援和“保護”下，那些脫離原宗主國的民族地區走上了獨立道路。三是金融壟斷資本的擴張，不必通過佔領和殖民方式即可獲得利潤，這是當代資本主義的最新特點，也是他們借此輸出“民主”，以破壞別國穩定來尋求金融主導地位的真實目的。所以，金融資本輸出的物件不是民族，而是國家；金融獲取利潤的手段也不是通過民族，而是通過國家；金融剝削的本質更不是依賴民族，而是依賴國家。也就是說，只要一個國家實行資本主

義民主化制度，金融資本的輸出與輸入就會得到保護。即便是接受金融資本剝削的國家，也會有一部分利益集團獲得相應的資本紅利，這部分利益集團也不是以民族為單位。

無論如何，當今世界的民主化浪潮與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是直接相連的，民主化的結果不會是民族國家經濟的普遍提高和民族大眾生活水準的普遍提高，而只能是兩極分化。那些以為民主化就會帶來自由和幸福生活的人，結果是必然的失望。但民主化的過程客觀上把民族國家的“民族性”減弱，“民主性”提高，使個人利益和要求成為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動力，而不是民族的發展與要求，即如今天的資本主義國家曾經走過的發展歷程一樣。所以，我們說，今天的各國政府是以“國家利益”來確定自己的政策和原則，而不是民族利益，當然，對於單一民族和主體民族來說，“國家利益”在一定意義上與“民族利益”是一致的，在很多特殊形勢下，以民族利益為口號藉以維護國家利益也是政府經常利用的手段，但“國家利益”高於民族利益是各國政府的共識。

綜上所述，兩次世界大戰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大工業生產的爆發力和西方種族主義者的結合。我們從兩次戰爭的策源地就能夠清楚地得出這個結論，但是，第一次戰爭的結局是暫時壓制了瘋狂的擴張意圖，卻更激發他們竭力利用科學技術提高戰爭機器的毀滅性。第二次戰爭的結局徹底打破了西方種族優越論者的神話，民族解放和獨立運動開始在全世界風起雲湧，其結果必然是“民主—國家”意識戰勝“民族—國家”意識。因為，民主的意識承認不管是什麼種族，人都應該是平等並自由的。戰爭結束了西方文明內部種族差別的鬥爭，使歐洲得以聯合共存，但是，西方文明圈以外，種族主義意識依然存在於人們的意識深處。

其實，人類思想的進步是非常緩慢的，儘管經歷了痛苦的戰爭和犧牲，儘管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儘管不同文明圈的人們彼此瞭解和資訊傳播已經相當的深入，但是，種族主義思想依然有牢固的基礎，種族優越論依然有廣泛的市場，種族意識與文明類型的潛在結合依然成為當今世界政治經濟矛盾和文明衝突的內在因素。透過西方理論和輿論的表面，你會發現，每當世界發生大的疫情、災難、衝突，甚

至自然災害，他們都會把責任歸咎於“那個民族或者國家”<sup>10</sup>，這種觀點會出現在主流媒體上，其無恥和無知的程度讓人吃驚！

美國國內的反種族歧視法是經過了幾代人血與火的拼搏取得的，也就是說，種族歧視在西方國家受到法律的反對是不久前的事情，但西方國家種族歧視的歷史卻十分久遠，與種族歧視相伴的就是對他們認為落後的弱小民族和國家的侵略與征服。相反，那些被這些“高等文明民族”歧視的民族卻很少有種族歧視的“傳統和歷史”，所以，在西方文明意識中，種族差別是一個“不言的事實”。今天，亞洲經濟的快速發展，一方面迫使西方國家開始承認不同文明和制度的創造性，另一方面，他們也最想證明這種“奇跡”是短暫的。所以，目前東西方對壘中包含有西方強烈的幹擾和破壞意識，也就不足為奇了。戰爭的進步意義在於：西方列強開始認識到“民主－國家”的普遍存在的必要性，承認不同文明的“民主－國家”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知道尊重別國選擇本國發展道路的權利。這個變化其實才發生不久<sup>11</sup>。

這個問題對我們啓發最大的地方在於，如何正確定位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一是中國周邊國家從“民族－國家”進入“民主－國家”的時間和特點。二是中國周邊國家中與西方國家的利用與被利用關係。三是跨界民族問題在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中的作用有多大。

在中國的周邊國家中，1945 年到 1947 年期間宣佈解放和獨立的就有：越南、老撾、柬埔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緬甸

<sup>10</sup> 2009 年 3 月開始，墨西哥爆發豬流感，在全球忙於抗擊豬流感之時，竟有人借機抹黑中國。先有被指為此次豬流感爆發源頭的墨西哥韋拉克魯斯州州長貝爾川大放厥詞，稱“是中國旅客把病毒帶到北美，然後傳到墨西哥”；接著，美《紐約時報》在其網站上亦刊登一篇題為“人感染豬流感疫情可能來自中國境內”的報導。對此，中國衛生部發言人毛群安 29 日強調，這些舉動是企圖混淆是非，詆毀中國形象。農業部首席獸醫師于康震則指出，中國以往發現的豬流感病毒與這次人際傳播的病毒，並不是同一種病毒。世衛方面則表示，目前沒有獲悉任何中國出現疫情的報告，對於坊間傳言頗感意外。而此前，墨駐華大使亦在北京“含糊”地表示：此次豬流感的病原體可能是從歐亞大陸被帶到墨西哥的。面對這種無賴式的誣衊，中國援助墨西哥的 500 萬美元和物質依然在 4 月 30 日飛往墨西哥。而在 SARS 期間，中國遭遇到的態度卻是西方世界的嘲笑和冷淡。西方主流媒體假借新聞自由，不斷刊登抹黑和詆毀中國的報導，其中的無恥和無賴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這早已不是什麼新聞了。

<sup>11</sup> 參考美國總統奧巴馬在 2009 年他的就職演說。



和朝鮮，如果以中國國民政府承認蒙古獨立的時間算，應該也是 1945 年。除了原蘇聯以外，幾乎所有與中國存在陸路邊界和海洋邊界的國家，都是由殖民地轉變為新生的“民族－國家”，也就是說，中國地緣政治環境中，伴隨這些新生的“民族－國家”必然產生跨界民族問題，跨界民族問題也因為處在這樣一個由“民族－國家”向“民主－國家”轉變的地緣安全狀態中而必然突出出來。

（本文於 2009 年 9 月 18 日投稿，於 2009 年 11 月 10 日審查通過）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獅子再餓，也不吃骯髒之食。賢者再艱難，也不取不義之財。

（藏族）

嘴上謙虛不難，行為謙虛不易。（哈尼族）

別因自己笨嫉妒別人，別因自己聰明挑剔別人。（滿族）

學生知少高聲唸，先生知多不出聲。（白族）

斧利吃木，人強進理。（侗族）

別在人前誇自己，別在人後論人非。（蒙古族）

像家鴿那樣溫順有禮，像野鴿那樣歌聲悅耳。（景頗族）

只要能擰成一股繩，紗線也能捆住牛。（苗族）

針離不得線，線離不得針。（佤族）

人拾一根大樑，大樑也會變得輕巧。（彝族）

一個鈕扣扣不緊，鈕扣成排吹不開。（白族）

好兒不享祖上福，好女不穿嫁時衣。（回族）

好吃不比嫩笠衣，好插不比爛泥田。（瑤族）

天黃有雨，天紅放晴。（布依族）

初雷不響，天不明亮。（納西族）

疾病易除，惡習易染。（塔吉克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清朝治理西藏體制的歷史考察

余祺燁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部哲學碩士

## 摘要

清朝自 18 世紀初，對西藏施行直接管治，以迄清亡。期間，清政府對西藏的管治體制，曾作出數次改革。本文以清政府的文獻和檔案為基礎，對清朝早期的治藏體製作歷史考察，再探討清朝晚期對治藏體制的改革，希望從中找出一些發展的脈絡。

筆者認為，早期的治藏政治體制改革，是按照一個“動亂—改革—安定—再動亂—再改革—再安定”的模式發展。而每次改革後，清廷都加強了對西藏的控制，最終發展成一個由駐藏大臣掌控西藏大部份世俗權力的管治體制。

19 世紀中葉以後，清廷對西藏的管治受到英國和俄國的挑戰。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清廷在光緒、宣統年間推行了多項措施整頓藏務，在內容上雖有創新，但基本上仍是“動亂—改革”模式。而且為時已晚，改革無法落實。

## 前言

清朝自 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起，對西藏施行直接的管治。在經歷 70 多年的探索和改革後，清廷終於在西藏建立了一套由達賴喇嘛、噶倫和駐藏大臣組成的有效管治體制，令西藏維持了長時期的安定。但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清朝國力衰退，在西藏的統治力量嚴重萎縮，加以英國和俄國在西藏進行侵略，清廷在西藏的管治遭到嚴峻的挑戰。在內憂外患的巨大壓力下，清廷終於在光緒、宣統年間在西藏推行了多項措施整頓藏務，以圖力挽狂瀾，可惜為時已晚。

本文以清政府的檔案為基礎，先對清朝早期的治藏體製作歷史的考察，再探討清朝晚期對治藏體制的改革，希望從中尋出一些發展的脈絡。

### 清朝早期治藏體制的歷史考察

清初順治、康熙兩朝的主要政治目標，是鞏固其在中國的統治，和加強國家的統一，因而無暇顧及西藏的地方事務。清廷當時對西藏的政治措施，主要是冊封和賞賜當地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與控制地方政權的和碩特蒙古貴族，對西藏並無施行直接的管治。

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清軍驅逐侵佔西藏的准噶爾。自此，西藏便正式納入中國的版圖，清廷開始對西藏施行直接的管治。康熙說：“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裏之地俱入版圖。”<sup>1</sup>

清廷在西藏的管治體制，主要是由達賴喇嘛、噶倫和駐藏大臣組成，而三者間的互動關係，亦隨著清廷治藏政策上的轉變而有所不同：

達賴喇嘛是全體藏人的宗教領袖；而長久以來政教合一的傳統，也使達賴成為藏人心目中最高權力偶像和政治領袖。清廷治藏的策略，基本上是承認達賴喇嘛的精神領袖地位，但由班禪喇嘛分享他在宗教上的權力；清廷更逐步削弱達賴和班禪喇嘛的世俗權力。

“噶倫”為藏語，意即大臣。清廷在西藏施行直接管治的初期，任命數名西藏貴族為噶倫，並分別授予貝子、公、台吉等爵位。這些噶倫的爵位雖有高低，但他們都以平等的地位協助達賴喇嘛處理日常政務。他們平等議事，而又各有分工，互不幹預。所以，這一管治體制亦稱為噶倫合議分轄制度。

1727 年（雍正五年），西藏發生內亂。達賴喇嘛與前藏系的噶倫聯手，襲殺後藏系的噶倫康濟鼐，引發前、後藏內戰。戰亂平息後，清廷將達賴父子遷往裏塘監視居住，又以平定內亂有功的後藏系噶倫頗羅鼐“統管前、後藏”<sup>2</sup> 1739 年（乾隆四年），清廷晉封頗羅鼐為郡王（俗稱藏王），主持西藏的行政。達賴喇嘛的崇高地位依舊，但其權力只限於宗教

<sup>1</sup> 張其勤(原稿)；吳豐培(增輯)：《清代藏事輯要》(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成都：新華書店，1983)，頁 82。

<sup>2</sup> 張其勤(原稿)；吳豐培(增輯)：《清代藏事輯要》，頁 114。

事務。乾隆明諭頗羅鼐：“達賴喇嘛係執掌闡揚西方佛教之人，爾係約束管理藏內人眾之人，爾二人同心協力，以安地方。”<sup>3</sup>這項安排在西藏開啓了短暫的政教分離時期。

1750 年（乾隆十五年），西藏郡王朱爾墨特那木紮勒（頗羅鼐的兒子）圖謀叛亂，爲清廷所殺。亂事平息後，乾隆認爲：“由今觀之，辦理噶倫之人，權勢不可使太專，是乃朕所加恩永輯藏地億眾生靈之要道也。”<sup>4</sup>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清廷決定廢除藏王制，並規定噶倫名額爲 4 人，3 俗 1 僧，只負責一般地方政務，具折奏事、驛站等重大事務，須報經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辦理。清廷雖然承認達賴喇嘛的政教領袖地位，但達賴不能獨立管理藏政，須與駐藏大臣協商辦理。

駐藏大臣創設於 1727 年（雍正五年）。根據乾隆所說：“所以命大臣駐藏辦事者，原爲照看達賴喇嘛，鎮撫土伯特人眾。”<sup>5</sup>又說：“國家因西藏地處僻遠，特命大臣駐紮其地，所冀得其情僞，控制由我。”<sup>6</sup>駐藏大臣初設 2 人，後改爲辦事大臣 1 人，幫辦大臣 1 人，均由滿、蒙重臣充任，任期 3 年。

駐藏大臣的地位和職權，在雍正、乾隆兩朝逐步發展和提高。最初只是作爲欽差大臣監督藏政，地方政務則由藏王所掌握。乾隆在平定藏亂後，立意提高駐藏大臣的職權。清廷在 1751 年（乾隆十六年）頒布《西藏善後章程》，廢除了藏王制，並初步確立了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並行的雙頭政治結構。1793 年（乾隆五十八年）清廷再頒布《欽定西藏章程》，全面提高了駐藏大臣的地位和職權，抑制了達賴喇嘛的世俗權力。根據這些規定，舉凡西藏的官吏任免、行政、財政審計、軍事、司法、涉外事務等權力，均由駐藏大臣掌握，其他事務上則與達賴、班禪分享權力。因此，達賴、班禪喇嘛的世俗權力，遠在駐藏大臣之下。光緒《清會典》：“置駐藏大臣以統前藏、後藏，而理喇嘛之事。乃正其官族，治其營寨，練其兵隊，固其邊隘，覆其財賦，平其刑罰，定其法制，以安唐

<sup>3</sup> 《清高宗實錄》，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乙丑條。

<sup>4</sup> 《清高宗實錄》，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丁巳條。

<sup>5</sup> 《清高宗實錄》，乾隆十五年二年庚辰條。

<sup>6</sup> 同上註。

古特。”<sup>7</sup>

駐藏大臣的屬員有：理藩院司員一員、理藩院筆帖式一員、後藏及拉裏及察木多糧務各一員、藏語及尼泊爾語翻譯各二員。另有游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多員。

經過 70 餘年的探索和改革，清廷終於在西藏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管治體制。由乾隆到清末的 100 多年間，這套以駐藏大臣箝制達賴、班禪喇嘛的管治體制基本上並無重大的變革。到 1906 年（光緒三十二年），清廷在內憂外患的巨大壓力下，才開始對治藏體制進行改革。

### 治藏體制的調整

促使清廷謀求改革藏政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駐藏大臣的威權墮落，而這又與大臣的素質低劣有關。清廷後期派駐西藏的高級官員，大多是平庸無能之輩，或是失意被貶之人。他們在西藏徒有辦事之名，不過護守印信而已，專求三年瓜代，轉回北京，於是駐藏大臣和幫辦大臣的威信漸失，權柄下移。尤其嚴重的是，部分駐藏官員貪汙受賄，賣缺鬻差，魚肉藏民，更引起藏人的不滿。1881 年（光緒七年）便發生因為幫辦大臣維慶“格外需索供應”，導致“後藏營官等帶領多人，圍署滋鬧，拋石打傷官兵”的事件。<sup>8</sup> 1884 年（光緒十年），戶部一名七品小官陳熾已大膽指出“向來駐藏大臣不皆潔清自守，往往橫徵暴斂，深恐番眾離心。”<sup>9</sup>

1906 年（光緒三十二年），奉命籌辦藏務的張蔭棠形容西藏的吏治說：

今藏中吏治之汙，弊孔百出，無怪為藏眾輕視，而敵國生心。查駐藏大臣歷任所帶員弁，率皆被議降革之員鑽營開復，幸得差委，身名既不足惜，益肆無忌憚，魚肉藏民，侵蝕庫款。駐藏大臣利其節壽，一切曖昧供億，反為諱飾，轉求商上墊借虧挪，又暗許其藉差浮冒報銷，以為抵償。藏中文武大小官，無不以邊防報銷為唯一之目的，此藏中員弁積弊也。又駐藏大臣照章會同達賴奏補噶布倫缺，陋規一萬二千兩，額外需索猶不止

<sup>7</sup> 崑岡等(續修)：《清會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卷 67。

<sup>8</sup> 西藏民族學院歷史系(編)：《清實錄：藏族歷史資料彙編》(鹹陽：西藏民族學院歷史系，1981)，頁 1725。

<sup>9</sup> 西藏民族學院歷史系(編)：《清實錄：藏族歷史資料彙編》，頁 1837。

此；挑補戴琫、甲琫各官陋規二三千至數百不等，藏官皆攤派於民間，民之何辜，罹此荼毒。至簽掣達賴之年，則尤視為利藪，故達賴醜詆為熬茶大臣，日形驕蹇，一切政權得賄而自甘廢棄...此駐藏大臣積弊也。<sup>10</sup>

另一個促使清廷改革藏政的主要原因，是列強對西藏的侵略日益加深。在清朝後期，英國和俄國對西藏虎視眈眈，英人極力否認清廷在西藏的主權。英、俄兩國又千方百計在西藏的僧俗統治階層內培植勢力，挑撥清廷與西藏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使清廷在西藏的統治岌岌可危。英人更於 1888 年（光緒十四年）和 1904 年（光緒三十年）發動兩次侵藏戰爭，迫使清廷容許英人到西藏通商和遊歷，及簽訂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清廷最後一位駐藏大臣聯豫在 1906 年（光緒三十二年）向清廷報告西藏的情況時說：“俄人覬覦於北，暗中誘之以利，英人窺伺於西，近且脅之以兵，藏人則愚頑性生，罔知利害。”<sup>11</sup>

1906 年（光緒三十二年），清廷終於認識到整頓藏務和鞏固西部邊防的迫切性，於是派遣候補五品京堂張蔭棠為欽差，前往西藏整理藏政。張蔭棠，字憩伯，廣東南海人，曾先後到美國和西班牙擔任外交職務。張氏到藏後，認為西藏的管治體制已腐敗到極點（見上文），於是首先參劾了以駐藏大臣有泰為首的一批貪官汙吏，積極整頓吏治。翌年（1907 年，光緒三十三年），這位曾經代表清政府到印度跟英人談判的欽差，向朝廷提出善後西藏事宜的 16 條建議，他認為“中國之治西藏，當如英之治印度。”<sup>12</sup>因此，他參酌英印之制，與中國財力所能辦者，而提出“以收回政權、興學、練兵為入手辦法”<sup>13</sup>的改革建議。換言之，收回政權便是張氏改革治藏體制的指導思想。

針對駐藏大臣的威權墮落，張蔭棠建議參酌英國的印度總督制，設置行部大臣替代駐藏大臣。他說：

<sup>10</sup> 〈張蔭棠參劾有泰等請代奏致外務部電〉，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合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頁 1514。

<sup>11</sup> 〈詳陳藏中情形及擬辦各事摺〉，見吳豐培(主編)：《聯豫駐藏奏稿》（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頁 14。

<sup>12</sup> 〈張蔭棠奏陳西藏內外情形並善後事宜折〉，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合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頁 1557。

<sup>13</sup> 同上註。

百年以來，駐藏大臣久已放失政權，非改革官制不足聳觀聽。擬將駐藏大臣、幫辦大臣兩缺裁撤，改設行部大臣，似宜特簡親貴或內外文武兼資大臣，畀以重權，便宜行事，以資鎮懾，所有達賴、班禪等均歸節制，以重事權，而定主國名義。其下應設左右參贊、左右參議四缺，分理內治、外交各局事務……。<sup>14</sup>

爲了達到收回政權的目的，張蔭棠主張“達賴、班禪擬請賞加封號，優給厚糈，專管黃、紅教事務。”<sup>15</sup>似乎是要實行政教分離，使政治不再宗教化，有利政治獨立發展和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張蔭棠又建議“于行部大臣署內設立財政、督練、交涉、學務、巡警、裁判、農工商、路礦、鹽茶九局…歸行部大臣節制。”張蔭棠這項建議，強化了駐藏大臣衙門的組織，而職能的劃分，顯然比較符合現代的行政管理思想，有利於矯正以往權限不清、分工不明的弊端；而各局的設置，亦是以開發建設西藏爲中心。對於地方基層的組織，張蔭棠則主張“擇繁盛衝要之處…先設巡警局、裁判局，…暫用陸軍、巡警、法律學堂畢業生署理，俟辦有成效，再行分別改設道、府、同、通、州、縣等缺。”<sup>16</sup>目的是加強對西藏基層行政組織的控制，並以曾接受近代教育的人擔任地方官員，有助在地方層面推動新政。

雖然朝廷亦承認張蔭棠的善後西藏事宜建議“頗多可采”，但“現值庫銀支絀，百廢待舉”，亦只能命令有關大臣“就現有人力、物力，分別緩急，次第籌辦。”<sup>17</sup>對於張氏所提出收回政權的種種建議，亦只有設立九局一項獲得實施。儘管張蔭棠在整頓藏務方面的實質成效不大，但他所提出的善後建議在當時是第一份最全面、最深刻、最先進的改革藏政方案。

晚清另一個改革藏政的重要人物是聯豫。聯豫，字建候，滿洲正黃旗人，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被任命爲駐藏幫辦大臣，後取代有泰成爲清廷最後一位駐藏大臣。1909年（宣統元年），聯豫奏請恢復駐藏幫辦

<sup>14</sup> 〈張蔭棠奏陳西藏內外情形並善後事宜折〉，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合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頁1558。

<sup>15</sup> 同上註。

<sup>16</sup> 同上註。

<sup>17</sup> 西藏民族學院歷史系(編)：《清實錄：藏族歷史資料彙編》，頁1841。



大臣駐紮前藏的舊制，並在後藏添設參贊一員以爲替代。初期，幫辦大臣本來是與駐藏大臣一起駐紮前藏，以便兩者合作商酌藏務。後來，清廷爲了防範英、俄兩國侵擾，便將幫辦大臣移駐後藏。聯豫建議恢復舊制，他說“今藏地百端待舉，籌維擘劃，斷非一人思慮所能周，必須互相斟酌，以期妥善。故請以幫辦大臣仍駐前藏，而擬添設參贊一員駐紮後藏，既以防範外人，並監督三埠，如遇有重要事件，大臣仍可馳往辦理，實于公事有益。”<sup>18</sup>翌年（1910年，宣統二年），聯豫奏請裁撤幫辦大臣，並於前藏添設參贊一員，作爲駐藏左參贊；而於宣統元年所設的後藏參贊爲駐藏右參贊，二人均由駐藏大臣奏保才能勝任的人員請旨簡放，在駐藏大臣的指揮下襄理政務。聯豫的理由是“所駐大臣兩員，政見一有參差，治理即多窒礙。賢者瞻顧依違，曲示和衷之誼，固不能奮發有爲；不肖者各逞意見，遇事掣肘，寢至百端皆廢，內啓番族之輕藐，外貽友邦之訕笑，於大局所關實非淺鮮。”<sup>19</sup>聯豫這項措施，是要加強駐藏大臣的權力，使駐藏參贊等官員皆服從駐藏大臣的命令，從而形成駐藏大臣對所有駐藏官員的一元化領導。

1910年（宣統二年），聯豫鑒於“西藏地方遼闊，各處自爲風氣，番官番僧皆可威福自專…”於是奏請在西藏各地酌設委員，“以上各員均令常川駐紮，管理刑名詞訟，其賦稅亦令清查數目，…至於振興學務工藝，招徠商賈，經營屯墾，調查礦山鹽場，皆責成該委員等各就地方情形切實籌辦。”<sup>20</sup>這樣，一個負責領導和組織西藏地方建設開發的基層行政組織便初具規模。

1911年（宣統三年），聯豫以“自上年川軍入藏以後，政權漸次收回，事務日繁，往來文件，較前增至數倍，幾與邊小省治無異，自應仿照各省督撫衙門章程，設立幕職分科辦事，以專責成。”<sup>21</sup>聯豫將原駐藏幫

<sup>18</sup> 〈聯豫等爲籌辦西藏一切事宜密陳詳情折〉，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合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頁1573。

<sup>19</sup> 〈聯豫奏請裁駐藏幫辦大臣改設左右參贊折〉，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合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頁1578。

<sup>20</sup> 〈聯豫奏西藏擇要添設委員折〉，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合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頁1576。

<sup>21</sup> 〈改設治事議事廳設立幕職分科辦事摺〉，見吳豐培(主編)：《聯豫駐藏奏稿》，頁168。

辦大臣衙門改建爲治事廳，作爲各科集體辦公的地方，又新建議事廳一所，作爲召集有關人士議事的地方。聯豫每天親臨治事廳辦公，遇到應該商酌的事時，即與各負責官員共同研究解決，並每隔十日在議事廳召集幕職及地方辦事人員開會一次，互通消息，討論西藏應興應革之事。經此改革之後，駐藏大臣衙門設有秘書員一員、協理兩員、吏科兼禮法科參事一員、度支科兼營繕科參事一員、軍政兼巡警科參事一員、交涉兼郵電科參事一員、學務兼農工商科參事一員、番務兼夷情藩屬科參事一員，體制明顯較以前健全完善。

### 結語

綜觀清朝統治西藏的歷史，可見早期的改革是按照一個“動亂—改革—安定—再動亂—再改革—再安定”的模式發展，<sup>22</sup>而每次改革後，清廷都加強了對西藏的控制，到 1793 年（乾隆五十八年），已發展成一個由駐藏大臣掌控西藏大部份世俗權力的管治體制。

清朝晚期的改革藏政，仍然不能擺脫上述的“動亂—改革”模式。由於駐藏大臣體制的敗壞和英國侵略西藏，迫使清廷謀求改革藏政。清廷的對策，是透過強化駐藏大臣的一元化領導，和任命委員管理西藏的地方基層行政組織，以圖進一步加強對西藏的控制，並抗拒外人的侵略。換言之，清廷只是延續前期的治藏體制，並加以改良，使其結構更合理化，更符合現代的行政管理模式。事實上，1907 年（光緒三十三年），清廷曾要求有關大臣討論應否將西藏改建行省，當時聯豫便上奏說：“夫以藏番之性情如此其狡詐也，而藏地之形勢如此其重大也，爲今之計，自非改設行省不可，萬無疑義。”<sup>23</sup>但是，聯豫亦指出，“忽然改設行省之命下，則番官必至於梗頑不從，因而生變，鋌而走險，不惟堅其外向之心，且恐禍起蕭牆，又不知煩幾許兵力，而得失尙難逆料也。”<sup>24</sup>根據聯豫的構想，“藏中之事，惟有徐徐佈置，設官駐兵，藉防英防俄爲名，而漸收

<sup>22</sup> 成崇德、張世明：《清代西藏開發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頁 10。

<sup>23</sup> 〈遵旨覆岑春煊奏陳統籌西北全局摺〉，見吳豐培（主編）：《聯豫駐藏奏稿》，頁 47。

<sup>24</sup> 〈遵旨覆岑春煊奏陳統籌西北全局摺〉，見吳豐培（主編）：《聯豫駐藏奏稿》，頁 48。

其權力，佈置既已周密，三四年後，只須一度綸音，則諸事均可就緒。”可推想當時清廷改革治藏體制的最終目的，是要完全控制西藏，而聯豫所推行的改革措施，祇不過是因應現實情況而作出的妥協安排。

晚清的治藏政策，固然有其延續性，但亦有其變異性，而這一點亦反映在治藏組織上。清朝早期對西藏的經營，只著眼在政治和宗教兩方面；對於開發西藏的經濟，則持消極的態度。因此，當時駐藏大臣衙門裏並未設有負責經濟建設的官員（見上文）。可是，英人第二次侵藏戰爭後，張蔭棠奉命整頓藏務，提出了開發西藏的建議，如發展西藏的農牧礦業、獎勵工商貿易等，而農工商、路礦、鹽茶等九局的設立，就是為開發西藏服務。而聯豫在西藏多地設置委員，目的就是要在地方層面推動經濟建設。這些組織上的變更，正反映了清廷治藏政策的轉變。

總而言之，清朝對西藏政策的目標，自始至終都是要確保其在西藏的統治，而前、後期治藏體制的變化，只是當局對不同現實情況的回應。辛亥革命爆發，結束了清朝的統治，亦為晚清在西藏的新政劃上句號。

（本文於 2009 年 8 月 20 日投稿，於 2009 年 9 月 25 日審查通過）

## 參考書目

成崇德、張世明：《清代西藏開發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崑岡等（續修）：《清會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清高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7）。

吳豐培（主編）：《聯豫駐藏奏稿》（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

西藏民族學院歷史系（編）：《清實錄：藏族歷史資料彙編》（鹹陽：西藏民族學院歷史系，1981）。

張其勤（原稿）；吳豐培（增輯）：《清代藏事輯要》（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成都：新華書店，1983）。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合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

## ◆稿 約◆

- 一、本刊爲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爲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店市二十張路 129 巷 2 弄 10 號 3 樓，劉學鈺。

電話：（02）2218-6116

0921-883325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季刊

名譽發行人：楊克誠  
發行人：阿不都拉  
社長：林恩顯  
主編：劉學鈞  
電話：0921-883325  
2218-6116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印刷者：晟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寧波西街 124-2 號 1 樓  
電話：2303-94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0197 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 1658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